

第八章

陝西主持黨政軍



飛將軍 蔣鼎文



一、與紅軍談判改編及抗戰

七個月之前，蔣介石急令蔣鼎文到西安，讓他出任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實質取代張學良，要求他指揮各部在三個月內剿滅西北地方的紅軍。

蔣鼎文銜命上任，然歷史的車輪中止了他們的腳步，「二蔣」的軍事計畫宣告破產。

七個月之後，盧溝橋的炮聲拉開了抗日戰爭的戰幕，蔣介石又急調蔣鼎文，讓其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當時他的主要使命是與漸漸恢復生氣的中央紅軍談判聯合，接受中央軍編制，國共兩黨團結一致，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軍這個民族大敵。「二蔣」的步履與時代潮流合拍，兩黨兩軍合作書寫了符合歷史進程的輝煌篇章。

蔣鼎文與陝西「緣分」不淺，與紅軍的「緣分」更深。不過在這個時點再接上，似有些偶然。「七七事變」後，為全面抗擊日本侵略軍的進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了五個戰區，其中第三戰區（華東一線）由馮玉祥出任總司令，戰區內



一九三八年蔣鼎文與蔣中正攝於西安杜公祠

所屬部隊為淞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所轄的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三十六師，這三個師組成了第九集團軍，張治中出任總司令；在第九集團軍的左翼，由陳誠為總司令的第十五集團軍布防，陳同時兼任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按照職責，前敵總司令可以指揮戰區內所轄各部，但張治中不願意聽從陳誠調遣。蔣介石知道，張治中是國民黨軍的抗日先師，五年多前，他與蔡廷鍇的十九路軍聯手在上海抗擊日軍，戰果可嘉，名聲尤為響亮。馮玉祥雖為戰區總司令，可要馮來指揮調度戰區內的中央軍是有難度的。為解決將領之間的矛盾，蔣介石把任西安行營主任不足半年，又新任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副主任的顧祝同調至第三戰區，出任戰區副司令，單獨成立副司令長官部，讓顧擔負實際指揮之職。憑顧的資歷和戰績，當時的張、陳兩人均不可能不聽他安排調度。

顧祝同調離後，西安行營主任這個重要職位的人選便落到了蔣鼎文頭上。蔣鼎文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上任的，初以代理名義出現，旋轉正。自此後至一九四二年一月離陝，在這四年半的時間裡，蔣鼎文在西北擔任了多個職務，主要是西安行營主任、第十戰區司令、陝西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軍委會西安辦



一九三七年於西安任行營主任

公廳主任等，某一時段，或集幾個職務於一身，或單獨任職。面對當時紛繁複雜的形勢，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與中共及其紅軍的聯合和爭鬥，抗擊日本侵略軍和支援後方，對西北楊虎城舊部的利用與控制，陝西省政府的行政改革、經濟發展以及地方安定等方面。

對紅軍的改編談判事實上從西安事變結束之後就開始了，其時的主要參與者是時任行營主任職的顧祝同。面對抗日的嚴峻形勢，國共雙方各有讓步和妥協，共產國際又指示中共，把當前主要任務放到爭取切實停止內戰、聯合政府共同抗日上來。各種因素所致，其時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方面顯得比較主動。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在向國民黨提出五個要求的前提下，還提出了四項保證，其中以「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這些原則最為重要。¹合作原則確定後，紅軍改編成國民政府軍的編制、人數、待遇就是雙方談判的關鍵節點。周恩來率先在二月十日提出將紅軍編成國民政府軍中的「四個軍十二個師」，其「待遇照中央軍」。

二月中旬，蔣鼎文打電話給西安行營的顧祝同，轉達蔣介石關於對中共和紅軍的改編意見，概括為以下幾點：「一、黨取消，都信仰三民主義；二、特區實行民治；三、紅軍編兩個師八個團一萬五千人。」²

顧祝同讓西安行營參謀長趙啟在二月十九日約劉伯承談話，將蔣鼎文電示的這一原則意見告知

1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六五二頁。

2 轉引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五〇頁。

對方。這就說明蔣鼎文在未出任西安行營主任之前就代表國民黨中央參與談判。

中共的反應很快，二月二十四日，周恩來提出：軍隊「人數讓步至六七萬，編四個師，每師三個旅六個團，約一萬五千人」。

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有所鬆口：「兩師八團可改為三師九團。」

中共中央其後多次提出增加編制和人數的方案，但蔣介石只同意三個師的編制，至於團一級同意增至十二個。

面對現實，為在生存中求發展，毛澤東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致電周恩來：「如蔣介石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¹

一個政黨擁有軍隊武裝是實力的體現，軍隊的人數、編制及經費自然重要，然至為關鍵的還是這支軍隊的指揮權問題。

蔣介石認為：改編後的紅軍「各師須直接隸屬（西安）行營」指揮；中共中央認為：改編後的紅軍「中共有獨立指揮權」，並且這三個師要成立獨立的總指揮部。

對這一關鍵節點雙方一直未談攏，致使協議遲遲未簽。直至盧溝橋事變發生，事情才有轉機。

蔣鼎文在七月二十七日接到蔣介石電文，讓他轉告中共，紅軍的改編應在十日內完成，以便南京政府發表三個師的番號。

為商定此事，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葉劍英面見了蔣鼎文，並把與蔣鼎文所談的情況向張聞天、毛澤東作了電文匯報：

¹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毛澤東年譜》（上），第六六〇頁。

洛毛並告朱彭任：

甲、頃見蔣鼎文，蔣云：

（一）老蔣今早電話，要鼎文催我們，照廬山所談在十天內改編後準備出動抗日，並即發表三個師的番號及其師旅團長與政治主任、副主任（康澤）名單。

（二）宋哲元致電蔣，願意抗戰與北平共存亡，要蔣速準備真面目戰鬥。

乙、我們代據你們電告鼎文：

（一）十日內改編完畢，待命出動無問題，惟改番號名稱須速發表宣言，要鼎文催蔣速發表。

（二）三個師四萬五千人由我們自己改編，我們所定編制送（西安）行營參考，他們並將一萬四千多人的調整師編制送來。

（三）政治主任、副主任及師、旅、團長名單容我們回膚（施）商定。

丙、鼎文答應照辦，但要我們快去快回，並要飛機明日去後日來。

丁、我們認為目前推動抗戰應立即改編，每師編足一萬五千人。如在延安開會朱彭任等明日應即乘兩車往延安。

戊、改編宣佈迅速及解決問題便利，最好毛、洛、張三人明日去機接來西安，後日一同轉往雲陽開會，不知便否，如何請立覆。

周博林葉七月二十七日¹

毛澤東作為洞察形勢的政治家，對此迅速作出反應，與洛甫（張聞天）聯名致電周恩來等，並請周讓蔣鼎文將要義轉達給蔣介石。全文如下：

周（恩來）博（古）林（伯渠）：

甲、請你們即去雲陽（陝西屬）商定改編。

乙、由雲陽回西安後，以根據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蕭（勁光）劉（伯承）張（浩）徐（向前）諸將領意見，告蔣鼎文以下之各點，請其轉達蔣介石：

（一）八月十五日前編好，二十日出去抗日。

（二）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

（三）三個師四萬五千人。另地方一萬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蕭勁光為副，軍餉照給。

（四）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散。

（五）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

（六）刺刀、工具、子彈、手榴彈等之補充。

洛毛二十八日辰¹

蔣鼎文向蔣介石力陳中共提出的要求，實現了周恩來等要求「快速發表」番號之目的。

七月三十一日，南京中央政府同意給予三個師的番號，並同意按中共所提之人數及編制改編。

八月二日，蔣鼎文給周恩來發出電文，轉達蔣介石的邀請，要周恩來「約同朱毛諸先生即來京面商大計」。

八月四日，南京中央政府正式頒佈紅軍改編後的番號，並由蔣鼎文電告中共中央。同日，蔣鼎文致電中共中央稱：

頃奉委座面諭：

- 一、限期貴部能於八日遲至十日出動，本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畢工作；
- 二、正副總指揮及宣言仍須得抗日實現時發表；
- 三、政訓主任及師旅團長均已照單發表，唯參謀長仍由中央選派。¹

這個電報等於事實上認可改編後的紅軍可以單獨設立總部，承認中共以前所提出的要求。

國民政府於八月二十二日正式宣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蔣介石委任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改紅軍為八路軍的命令，主要是：

¹ 轉引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七四頁。

南京已經開始對日抗戰，國共兩黨合作初步成功。為著實現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会紅軍改名之保證，推動這一抗戰成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戰爭，我們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著將：前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七十四師合編為陸軍第一一五師，以林彪為該師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二方面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獨立第一、第二兩師及赤水警衛營、前總直之一部等部，合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師，以賀龍為師長，蕭克為副師長；四方面軍二十九軍、三十軍、陝甘寧獨立第一、二、三、四團等部，改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九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以上各部改編後，人員委任照前總命令列之。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成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¹

由於國民政府軍戰鬥序列調整，原各路軍的編制改成集團軍。九月十一日，國民政府軍委下達命令，將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部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朱德改任總司令，彭德懷改任副總司令。

紅軍改編後，蔣介石、蔣鼎文、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紛紛致電祝賀，其中蔣鼎文的賀電為：

¹ 參見《毛澤東年譜》（中），第十六頁。

率部抗敵，壁壘新增，行見馬肥首宿，壯秋塞之軍容；酒熟葡萄，勵沙場之鬥志，揚我國威，挫彼寇焰，河山還我，指顧可期。¹

蔣鼎文之賀電雖不乏禮儀辭令，然鬥志昂揚，期望殷殷，頓添友軍的喜悅之情還是溢滿詞裡行間。作為友軍的鄰居、地方最高軍政首長和談判的直接參與者，對於這種階段性成果的取得，自知來之不易，亦會比別人多一分成就感。面對眼前民族即將淪亡的現實，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罷，將紅軍統一改編成國民政府軍，當然是為了師出有名地參戰，在這一點上雙方沒有分歧。問題的焦點是以何種方式參戰。

關於調動共產黨武裝參戰之事，在紅軍沒有改編成八路軍之前，也是由蔣鼎文向葉劍英透露的。這個重要消息的透露當然是蔣介石授意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葉劍英當時在陝西三原，代表紅軍負責與國民黨方面在作兩軍的接洽與談判。蔣鼎文告知葉劍英，中央有調動紅軍北上抗擊日軍的打算。當葉劍英得知這一重要消息後，即於當天致電中共中央，說明：日本關東軍目前紛紛入關，駐朝鮮的日軍亦已開動，日本國內亦調動兩師團來華，晉綏方面亦同時有軍事行動。據此，南京方面正準備在石家莊地區集中十個師的兵力，華北戰局將從此擴大，紅軍有被調往察綏的可能。²

中共中央對葉劍英彙報的資訊極為重視，並迅速作出反應，毛澤東在第二天以他和朱德、彭德

¹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² 轉引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八二、八二、七六頁。

懷等將領聯名的形式聲明：

一、蔣委員長及政府決心抗日，我們竭誠擁護，願在委員長指揮下努力殺敵。二、紅軍主力準備隨時調動抗日，並已下令各軍十日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三、同意擔任平綏線作戰任務，並願以一部深入敵後打擊敵人。四、唯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好能與善於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更能順利地完成國家所賜予的使命。¹

對於中共中央所釋放出的資訊，蔣介石、何應欽等亦及時知悉。

其後，在兩黨談判中，國民黨力圖把紅軍納入自己的指揮體系之中，而毛澤東在紅軍主力參戰方式、開往前線問題上，態度較前也漸漸發生變化。

七月二十七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從上海返回西安。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與張聞天聯名致電三人，要他們立即趕赴雲陽，會同紅軍其他領導人共商部隊改編事宜。

蔣介石給紅軍下達三個師的番號後，於八月三日電告周恩來，要求紅軍向綏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發抗日；至次日，蔣介石正式通過蔣鼎文下令，要紅軍八月二十日出發，二十五日到山西大同集中。

然毛澤東對紅軍的參戰有自己的看法。八月一日，他與洛甫共同署名電告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關於紅軍作戰，依當前敵我情況，須堅持「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

¹ 轉引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八二、七六頁。

戰爭」，以發揮紅軍特長；依此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而對劉伯承一二九師的開拔，則「非把國共間各主要問題弄好後決不出發」。¹

在參戰方式和投入上，中共中央內部也認識不一。為統一意見，毛澤東在八月二十二日於洛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說明了「國民黨在抗戰問題上的進步是值得讚揚的……然而對共產黨的關係也沒有進到真誠合作的程度」，²顯然防範心理在加重。洛川會議就軍事與兩黨關係問題終在黨內達成原則意見，即要保持黨與紅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紅軍參戰開赴前線的具體事宜，是由蔣鼎文代表國民黨中央與八路軍作軍事聯絡和轉達命令，並核查八路軍是否按蔣介石發佈的命令執行。八路軍的第一一五師、一二〇師是八月下旬奉命開拔的，一一五師則是九月上旬由侯馬車運至山西原平，依照蔣介石對八路軍的第一號訓令所示線路，出擊至涇源、廣靈、靈丘地區。不意連日大雨不絕，鐵路又遭飛機轟炸損毀，導致參戰部隊未能按照所限時間到達目的地。對此，蔣鼎文也據實向蔣介石報告：「連日多雨，道途沮滯而黃河水漲流急，渡河均感十分困難，確屬實在情形。」³

但是蔣鼎文壓力太大，蔣介石多次要他督促八路軍儘快兵發前線，奈未能如意。蔣鼎文只好再次商之於中共，這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八月三十日發給毛澤東、洛甫的電文中也反映出來。電文如下：

1 轉引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八二、八二、七六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五三頁。

3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毛洛：

甲、須見蔣鼎文談如下：

(一) 蔣給鼎文電話，告以：

1. 中共宣言簽字後，即發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今已在各報公布）。

2. 邊區候榜任找得，後即發表。

3. 我問鼎文何以第八路軍至今猶未過河。

(二) 錢宗澤（鐵路運輸司令）電告鼎文侯馬已備到車多輛，何以紅軍久不到。

(三) 南口、張家口失守後，保口兩部猶在居庸關側面，劉汝明部則潰退，幸傅楊兩部趕到穩住陣線。晉綏及南京均望紅軍早到。

(四) 目前戰爭中心移至上海，第一軍已增加淞滬，張治中撤職，陳誠、顧祝同在滬蘇指揮廣東三個師亦將開蘇寧，廣西先頭部隊來到武漢。

(五) 鼎文已面許即日通知各方不得再稱偽黨匪軍，並道歉以後有關行政民運黨務均介紹以林（伯渠）當面解決，不再在下面對立。

(六) 關於遣散經費，我們要其即發或先從前方辦起，他（鼎文）已答應。

乙、我們意見：

(一) 博古即去南京專門交發表中共宣言；蔣之談話及釋放政治犯事如與國民黨（或至國民政府）獲得了諒解，且語無問題，即可簽發。

(二) 邊區如我們推薦之三人一時不能任主任，即以林為副主任代主任。

(三) 先頭第一一五師，宜速開侯馬車運北上，第一二誘及一二九兩師主力亦宜續開；如宣言及邊區萬一再有問題，則到時扣第三個師亦得及。

(四) 周等彭到即去太原轉南京。

(五) 南京發之資材共有三百七重，需汽車一百五十輛搬運。

丙、如同意，立即令前總與各師開動；並令其將開動路線、日程電告我們，因（西安）行營及南京均欲知道我行軍序列。

周博林

（八月）卅日末¹

而毛澤東認為，南京政府作出戰略規定以後，八路軍對是否執行有其自由，更不能催促太迫，特別是對「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八路軍有其優勢，不能按照國民黨軍正面陣地戰要求，調八路軍去參戰。為此在九月十二日，毛澤東針對性地致電彭德懷，強調八路軍須有「三個自由，一個堅持」：

一、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現在蔣鼎文還在說劉（伯承）師應速上前線，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團於一個狹小地域實不便於進行遊擊戰爭，如果是這樣，可見我們對此原則並

¹ 《中共黨史資料》二〇〇七年第二期，第二二頁。原注釋為七月二十七日，曾景忠先生有考證文章，認為此電報日期有誤，應為八月三十日。筆者對照史實，亦認為曾說準確，故採用。

未向他們有過澈底堅持的說明；或者他們含有惡意即企圖迫使紅軍打硬仗。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如不弄清這一點，必將發生無窮糾葛，而紅軍之偉大作用決不能發揮。三、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四、堅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則。¹

至九月十三日，日軍佔領大同。也許是各部未能按時到達防地，客觀上使日軍在佔領大同上比較輕易，特別是對劉伯承二二九師未能及時移動一事，蔣鼎文頗有問責八路軍未切實執行命令之意。蔣鼎文這一強硬態度，被毛澤東認為是「無理」，因而在九月十四日，毛致電林伯渠，讓其轉告蔣鼎文：

遊擊戰爭與按照情況使用兵力，是朱、周在京與蔣、何、白、黃決定之戰略方針與指揮原則。紅軍主力已上前線，多兵堆於狹地不合遊擊戰使用，因此一二九師留駐待機是完全正當的。蔣鼎文身為軍人不懂軍事，還應加意學習我們的兵法，依照他的無知妄想是要打敗仗的。²

顯然，蔣鼎文不知道早在上月下旬的中共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強調「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鉗制和相機

¹ 參見《毛澤東年譜》（中），第二〇頁。

² 參見《毛澤東年譜》（中），第二二頁。

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其時中央內部也意見不一，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博古等要求將主力開赴前線，不能放棄運動戰，可毛澤東、張聞天等不同意這樣做。而蔣鼎文一再堅持要八路軍進入陣地作戰，這與中共的「山地遊擊戰」方針根本相違背。從這個角度講，蔣鼎文不可能懂得八路軍的「軍事部署」，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的軍事戰略。毛澤東在公開場合要求軍政領導人向各方解釋，紅軍不會打陣地戰，不會在平原作戰，不習慣被集中指揮；而在內部場合則明告各級領導人，紅軍不應該集中作戰，兵力要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中心目的就是要趁時保存和擴大紅軍武裝力量。¹也有可能，按照毛澤東其時所擔心的「他們含有惡意即企圖迫使紅軍打硬仗」。可見兩黨在抗日的戰略上還是各行其調，所以蔣鼎文與毛澤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以至毛澤東講出了「蔣鼎文身為軍人不懂軍事」的狠話。有要注意的是，作為後人引用這些話語要放到歷史背景去，不宜斷章取義，作偏面的理解。

也就在這一時期，蔣鼎文按照國民政府軍委統一部署，又催促周恩來讓八路軍按指定地點儘快集結，未果。蔣鼎文乃感到八路軍在藉故拖延開拔進度，於是在九月十四日，蔣鼎文電告蔣介石：

頃接周恩來電稱，正率第十八集團軍主力向指定地域開進，惟同蒲路運輸困難，部隊未能迅速前進等情。然深慮其藉所稱各種情形，有意拖遲前進，乞再電周恩來促其趕進等。²

1 參見楊奎松著《讀史求實》，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二一九—二二〇頁。

2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蔣鼎文所不可能知道的是，其時毛澤東已認定，對他的催促一概置之不理，哪怕他電請蔣介石親自出面催進，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直至九月二十日，蔣介石向八路軍發布第二號訓令，要求「第八路軍速進出涇源、蔚縣，擊破該方面之敵」。稍後，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部與閻錫山部配合，在山西平型關打了一場頗具戰果的伏擊戰。

初戰獲勝並不意味著兩軍已配合默契，相反兩黨兩軍的防範與反防範心理始終未除，並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愈演愈烈，其關鍵節點還是體現在軍隊指揮權和人員配置上。

國民黨方面，在改編紅軍的同時，要求派遣參謀長或高級參謀人員到八路軍任職，用意十分清楚，即或不能控制部隊，也能監視督促其軍事行動。

共產黨方面認為，如欲同意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派出參謀人員則是喪失獨立性和自主性，毛澤東意見非常明確，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這一問題雙方無法達成一致。到了九月九日，康澤率派駐八路軍的高級參謀一行五人到達西安，而毛澤東早在十多天前就明確表態過「不要康澤」。蔣鼎文隨即通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代表林伯渠接洽，同時讓林通知延安，康澤等五人準備赴八路軍任職。

林伯渠是有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他一面告訴蔣鼎文說：「十八集團軍在行進中，總指揮部所在地地址不明，俟到達目的地後，再為通知」；一面迅速通知延安中央，國民黨所派軍政人員已到達西安。此後一星期，林伯渠未答覆蔣鼎文延安方面是何態度。

為此，蔣鼎文在九月十六日直接致電朱德，並通知朱：「委座派赴軍部之高級參謀趙錦文、劉

伯龍、李放六、喬波材，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等五員已抵長安。」

朱德覆電蔣鼎文說：五位大員的到來，已引起八路軍和全體將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軍可以為國效力，即應信任自主作戰，要是派了監軍，恐怕會使官兵心生疑懼，影響戰鬥力。

在這同時，蔣鼎文又與林伯渠不停地接洽聯絡，其時林伯渠已接到毛澤東對此事的應對意見，於是他轉詢蔣鼎文：南京所派之人是不是作為聯絡參謀？蔣鼎文答稱這些人均為到八路軍任職的正式參謀。林依據毛澤東電示回答說：來人如只任聯絡，則歡迎去八路軍總部；如以正式參謀身分去，恐深有不便，因紅軍將領堅決不同意他們去，為此已向南京交涉改變派員。這樣做並非對個人，而是南京應該信任紅軍的問題。林伯渠同時表示，聽說周恩來在京時，蔣委員長並無派遣政治部人員與參謀之意，此舉恐係康澤個人意見。蔣鼎文解釋說此舉實為蔣委員長批准。林伯渠則堅持，不論協商結果如何，他這裡一切須聽命於延安中央，中央未有決議接受之前，無法同意讓這些人員前往第十八集團軍。¹

中共的斷然阻攔極大地刺激了國民黨人。原擬派往第十八集團軍做政治部副主任的李秉中壓耐不住心中的憤慨：綜觀中共拒絕中央派員，擴張地盤，巧妙宣傳以爭取民眾，「可斷言（其）此次投誠毫無誠意，現正大規模作奪取政權之準備」。他強烈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除以「暫緩發餉」壓迫中共務必接受中央派員直接監督外，還應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嚴禁有為中共張目之宣傳報導，國軍更應加強補充，爭取抗戰結束，「亦能鎮壓反動」。²

1 參見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八九頁。

2 轉引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三九一頁。

蔣鼎文是代表國民黨方面與中共直接接觸的最高軍政首長，他的報告是蔣介石獲取第一手資訊乃至決策的最重要來源，蔣鼎文於十月一日、十月四日向蔣介石報告：

朱、毛部隊雖已大部開出，就職觀察，一切絕對無誠意，不過藉此擴張其勢力。查共黨表面雖為歸順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終毫無誠意。廬山所決定者，並不確實履行。派往之政訓副主任、高級參謀，則絕對拒絕派往。傳達命令之參謀，亦婉拒不見。本行營派往陝北之視察組，亦來函拒絕，謂恐保護難周。一二九師則遲不開拔，種種要素則幾同命令，若面與交涉，則又純用狡猾、敷衍之手段。職之觀察，彼方絕無誠意。不過藉此公開擴張其勢力。近來周恩來等遲不赴京，其中作用俟晉京面呈。¹

由此可見，往八路軍派充參謀，以掌握其動向，僅僅是蔣介石的一廂情願而已。一方要派，一方堅拒，此事就陷入難解之僵局。

二、陝甘寧邊區的紛爭

如果說中共其時在紅軍改編為國民政府軍問題上還有所讓步妥協的話，那麼，在蘇區的地盤上，也即在圍繞陝甘寧邊區問題上，則是寸步不讓、寸土必爭。當時由於中日兩國已開戰，兩黨在軍隊問題上求同存異更為迫切，故而邊區一事的紛爭暫時掩蓋了片刻。然而在生存命脈之地，中共是不

¹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會妥協的，且還是要適時擴大發展的。

陝甘寧邊區爭執的實質一是範圍大小，一是誰來主導。當然在地理上也有複雜因素，國統區與邊區毗連，犬牙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陝甘寧邊區東臨黃河，北靠長城，西連六盤山脈，人口約一百五十萬，面積十三萬平方公里左右，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中共武裝的戰略總後方。

在什麼階段提出什麼問題，毛澤東對時機的把握顯得遊刃有餘。平型關大捷「收官」之日，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再提陝甘寧邊區問題，並由林伯渠轉至蔣鼎文。電稱：「陝甘寧特別區問題，早已向南京提出，拖延半年之久尚未解決，請再提交蔣鼎文先生轉蔣介石先生，速為解決並發表，保障紅軍在前線安心殺敵。」具體要求包括：

甲、承認特區的民選制度，特區政府由人民選出，可以由南京加委；

乙、加委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洪濤、馬明芳、高崗九人為特區政府委員，以林伯渠為行政長官，張國燾為副長官（堅決拒絕丁維汾，因為他是最先提倡反共及反共最堅決之一人，全蘇區人民誓不承認）；

丙、設民政、建設、教育、農工、財政五廳（反對設處）及保安司令部；

丁、特區範圍包括宜川、鄜縣、洛川、淳化、枸邑、正寧、寧縣、合水、慶陽、西峰鎮、鎮原、預望堡、環縣、鹽池、定邊、安邊、靖邊、橫山南部、安邊（包括瓦窯堡）、米脂、綏德、清澗、葭縣、吳堡、神府蘇區、延川、延長在內；

戊、特區經費每月十五萬元，另善後、遣散費六十萬元。

己、保安師編九千五百人。

同時強調，所提六項要求是最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予以全部同意，不達目的，決不休止。¹

陝甘寧邊區問題久談未決，早在八月三十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康澤乾脆直接通知中共代表：邊區政府已決定以丁維汾為正、林伯渠為副。中共中央得此消息，針鋒相對，致電自己的談判代表：「丁維汾是過去反共首領，蘇區民眾決不承認他為長官，必須以林伯渠為長官，張國燾為副長官。」

對於邊區政府人事安排，中共已不顧國民黨的意見，獨立行動。九月六日，陝甘寧特區政府宣佈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以林伯渠為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下設民政、建設、教育、財政四個廳，糧食、稅務兩個局。因中共中央決定林伯渠任長江沿岸中共代表，邊區的日常工作由張國燾負責。然這一職務的安排，也為次年張國燾藉故離開延安提供了方便。

這一時段，陝甘寧邊區問題多在林伯渠和蔣鼎文之間談判，因為他們兩人一個是「邊區政府主席」，一個是「邊區大多屬地所在的陝西最高軍政首長」，然雙方各執己見，在實質問題上毫無進展。

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二十日蔣介石邀王明、周恩來至武漢商談兩黨系列問題，其中邊區問題即為重要議題之一。根據形勢變化，中共姿態有所調整，陝甘寧的地盤爭取不變，而在政府人選上作靈活變通：

一、邊區管轄範圍定為下列各縣：延安、甘泉、鄜縣、洛川、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邊、定邊、淳化、枸邑、寧縣、正寧、鎮原、固原、海原、靖遠、鹽池、環縣、慶陽、合水、甘泉、三縣。

二、邊區組織設邊區行政長官一人，副長官一人，下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農工各廳及

¹ 轉引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九〇—九一頁。

保安司令部。

三、邊區行政長官人選以丁維汾正，林伯渠副，丁維汾因公不赴任，由林伯渠代理，邊區行政委員會定為八人，人選為丁維汾、林伯渠、張國燾、徐特立、高自立、馬明芳、高崗、成仿吾，各廳長由委員分別擔任之。

對於這一方案，國民政府作出回饋：

一、管理縣份，限於十八縣，不允增加。

二、邊區政府，丁正林副並代理正職，可發表。各處依省例分民、財、權、建，不允設農、工，並要丁派兩人做事。

顯然雙方的差距依然明顯，未能達成一致。

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份，蔣鼎文的職務發生變化。鑒於原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不甚得力，蔣介石經過運作，讓蔣鼎文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和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主任委員。由此，軍、政、黨三權名正言順地集中於蔣鼎文一身。

蔣介石在七月十九日電告蔣鼎文，稱陝北特區問題及其範圍、許可權應從速規定，你們不能再拖，請從速派員來漢口或來文詳告。七月二十二日，蔣鼎文即電報蔣介石，解決陝北問題已擬就方案，由谷正鼎攜方案到漢口面報。¹

蔣鼎文出任省主席以後，首先對陝西省原有行政督察區進行增設和調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調整完畢，其時陝西全省計九十二個縣，分十個行政督察區管轄。

¹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第一區：榆林、神木、米脂、府穀、葭縣、靖邊、定邊、橫山，共八縣；

第二區：綏德、膚施、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定、清澗、吳堡，共九縣；

第三區：洛川、鄜縣、中部、宜君、宜川、甘泉，共六縣；

第四區：商縣、雒南、商南、鎮安、山陽、柞水，共六縣；

第五區：安康、白河、鎮平、漢陰、洵陽、平利、嵐皋、紫陽、石泉、寧陝，共十縣；

第六區：南鄭、城固、西鄉、洋縣、沔縣、鎮巴、保城、寧羌、佛坪、留壩、略陽、鳳縣，共

十二縣。

第七區：邠縣、乾縣、耀縣、禮泉、同官、長武、永壽、枸邑、淳化，共九縣。

第八區：渭南、華陰、華縣、潼關、平民、朝邑、郃陽、韓城、大荔、澄城、蒲城、白水，共

十二縣；

第九區：鳳翔、隴縣、汧陽、寶雞、岐山、扶風、武功、郿縣、盩厔、麟遊，共十縣；

第十區：咸陽、富平、三原、涇陽、高陵、興平、鄠縣、長安、臨潼、藍田，共十縣。¹

不難看出，陝甘寧邊區所屬的該省縣鎮均納入陝西省行政督察區管轄，其中第二、第三行政區幾乎囊括邊區陝屬各縣，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力圖以這樣行政區域統一管理的方式，逼迫共產黨就範。

蔣鼎文在行政區域調整的同時約共產黨代表會談。八月十二日，蔣鼎文以新任省政府主席的名義，通知林伯渠：邊區問題行政院來電由陝省就近解決。並派出陝西省政府委員彭昭賢、谷正鼎等人前往交涉。十六日，中共中央電示林伯渠，邊區必須堅持二十三縣，但可用清澗、綏德、米脂三

¹ 陝西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民國時期陝西省行政機構沿革（一九二七—一九四九）》。

縣改換同原、海原、靖遠三縣，月經費要十萬元。而蔣、彭、谷等人堅持邊區必須實行專員制，行政區域納入陝西省政府管轄，不要邊區政府組織，區域只能十七縣。顯然，對這樣的條件，中共是不可能讓步的。

陝甘寧邊區方面也加快合法化步伐。一九三九年一月，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召開，民主選舉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員和法院院長之職。中共以這種方式，針鋒相對地回答陝西省政府取消邊區，納入行政專員區管理的企圖。

同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蔣介石提出「溶共」主張，提出「對中共是要鬥爭，不要怕它」。於是國民黨首先否認中共成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性，授意所在地省政府「自動以種種必要手段，恢復管轄權力」；繼而提出將陝北行政區域劃分為三個行政區，「第一、三兩個行政區之專員、保安司令及各縣縣長，由本黨遴選忠實精幹有鬥爭經驗之同志擔任，第二行政區，則准由中共推薦，由省任命。」此法如果行不通，第二方案在邊區目前所據之區域，成立陝北行政委員會，但須直屬於陝西省政府管轄，「其人選得由共黨提出名單之一部分，向陝西省政府推薦，經核准後任用。」¹

雙方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形成死結，一直無法解開。共產黨方面至少要二十三個縣，國民黨方面至多給十八個縣；邊區縣屬所在地，省政府要行使行政職權的現象，而邊區政府不予理睬，於是雙方各派縣長，出現了同一個地方雙重政權的現象，摩擦越來越劇烈。其間雖經周恩來與蔣介石直接面談，以防止兩軍干戈相見，但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¹ 一九三九年六月《共黨問題處置辦法》。

軍事摩擦終於開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蔣鼎文聲言，中共在陝北河防薄弱，如不加強，恐日軍有機可乘，乃調派騎二師徑入陝甘寧邊區；同時又將第二十八師化裝成保安團，奪取原為中共所控制的七里鎮等戰略要地；中共中央從晉察冀調王震三五九旅回援陝北，形成軍事對峙。與蔣鼎文緊相呼應的是，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朱紹良也派兵欲佔領甘肅省屬的邊區部分縣分。

好像約定似的，國共兩黨並不正面開打大仗，而是實質性的軍事佔領。蔣鼎文令胡宗南部先後佔領了原為八路軍防地的枸邑、淳化、正寧、寧縣、鎮原五座縣城；而王震的三五九旅則與留守的中共地方武裝部隊配合，在綏德地區擊潰綏德專員何紹南的保安隊。此前，何紹南組織綏德、清澗、吳堡三縣保安隊，攻打陝甘寧八路軍的防區。王旅的軍事行動迫使何紹南逃離綏德。中共軍隊控制了綏德、米脂、葭縣（今佳縣）、吳堡、清澗五縣約五十萬人口，陝甘寧邊區向北擴大了一大片土地，從而使陝甘寧邊區與黃河對岸的晉綏解放區聯成一片，產生了集聚效應。雙方似乎各得其所。事實上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在不斷壯大，國共兩黨的摩擦已不僅限於陝甘寧邊區。當然鑒於大敵當前，雙方在軍事爭鬥上還是有所節制的。

三、接納張國燾

蔣鼎文自己也許沒有想到，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他竟以如此不同的方式與中國共產黨的兩位元重要領導人直接「對話」。前一位是瞿秋白，他所網羅的保安隊將瞿捕獲，軟硬兼施勸降無效後，將其殺害；後一位是張國燾，張以主動脫離共產黨的方式欣然投向他的懷抱，請求他保護其生命安全。

張國燾其時雖非在中共核心決策層之內，但其地位之重要，影響之巨大還是毋庸置疑的。他是共產黨的開創者之一，是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在革命根據地開創時期出任紅四方面軍總負責人，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他出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由於主席林伯渠長期派駐西安等地，邊區的實際工作由其主持。

西安事變後，兩黨緊張關係趨緩。清明時節，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或專程或派要員向黃帝陵致祭的同時，也邀請陝甘寧邊區的中共代表派員陪祭。黃帝陵坐落在延安之南部的中部縣（今黃陵縣），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帝素受海內外華人的敬仰，社會各界緬懷不絕，每逢清明節，都要舉行祭陵活動。在這種非常的歷史時期，國共代表同祭黃帝陵既是雙方合作的象徵，也表示出中華民族共禦外侮的決心，故香火之盛異於他時。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國民黨派張繼、顧祝同代表國民黨中央，派陝西省主席孫蔚如代表國民政府主祭；而中共方面則由林祖涵（伯渠）陪祭，並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呈讀祭文。

按照慣例，一九三八年的清明節也是共同祭掃。這次國民黨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為西安行營主任、中央執監委員蔣鼎文，而中共需有相應級別官員陪祭，以共同主持儀式。

至於中共為什麼派張國燾作代表，未見到相關的記載，可能是他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的身分所致，張自己的回憶也提到這一點。

張國燾為人處世工於心計，深藏不露。楊尚昆曾評價他：「臉上沒有表情，說起話來很慢，還

哼哼哈哈，在肚子裡打主意。」¹

那時的張國燾並不忙碌，他頗為自得地說：「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他很少來麻煩我。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靜地設計走自己的道路。」²張國燾這次的祭掃隨行人員有他的陸秘書、警衛員張海和一個警衛班，他們合乘一輛大卡車，經甘泉、酈縣、洛川到達中部縣。

四月五日清明節，蔣鼎文會同省政府主席孫蔚如、省黨部負責人任覺伍、谷正鼎等到達中部縣。蔣、孫、張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蔣鼎文在黃帝陵前宣讀祭文，全文如下：

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特派委員蔣鼎文代表謹具牲醴鮮花之儀，致祭於我民族始祖黃帝之靈曰：

莽莽神州，聖祖始作，掃蕩蚩尤，奠定華夏，橋山尺例，萬國被化。嗚呼！運丁陽九，倭夷肆毒，竭澤傾巢，狼奔豕逐。哀我黎元，罹茲殘酷，緬懷遺烈，益深恥辱。披髮纓冠，舉國同仇，攘彼梟陰，奮我戈矛。誓爭獨立，流血斷頭，繩繩子姓，共濟漏舟。維我華胄，決決雄風，地廣人眾，物力靡窮。艱難締造，先舉豐功，圖有救亡，四海景從。不屈不撓，敢告蒼穹。靈爽在天，照臨下土，雲旗車馬，庇我疆宇。民族復興，克繩祖武，令節奉先，來陳尊俎。神其格歆，鑒此精禋。尚饗！³

1 《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一三九頁。

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四三〇頁。

3 黃帝陵管理局編：《黃帝祭文集》彙編本，西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顯然，面對「倭夷肆虐」，全國人民要「披髮纓冠，舉國同仇」，走「民族復興」之路，這篇祭文是契合時代場景的。張國燾的祭文內容未有見到。

祭祀儀式完畢後，張國燾對隨行人員說：「你們先開車回延安吧！我還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主席商量。」據張國燾的警衛員張海回憶，他當時焦急地對張國燾說：「毛主席不是說了，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

張國燾沒有理睬，據說祭掃一畢，張國燾將自己準備脫離共產黨的意願略略告訴蔣鼎文，然後與蔣鼎文同乘一輛小汽車駛往西安。張海以護衛張國燾安全之名，設法搭上蔣鼎文警衛人員的大卡車，雖然略遲到達西安，終還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張國燾。其時蔣鼎文也住在招待所內。張海繼續回憶道：「看到他鬼鬼祟祟的行動，很生氣，就產生了懷疑，心裡想：張國燾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為什麼到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軍駐西安的辦事處，卻住在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呢？」¹

當蔣鼎文真正明白張國燾隨他赴西安的意圖後，便急忙將這一重要情況電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問了大概以後，即要蔣鼎文通知戴笠安全護送張國燾到武漢來見他。於是張國燾在特務們的嚴密「保護」下乘火車抵達國民黨的臨時首都武漢。張國燾到武漢後，中共代表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李克農聞訊後亦先後而至，苦口婆心勸導張國燾返回延安，不成。四月十一日，張國燾打電報給毛澤東、張聞天：「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四月十二日，毛澤東等五人聯名給張國燾電文勸告：

¹ 張海：《橫眉冷對，英勇無畏》，載《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

國燾同志：

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¹

張國燾四月十六日上午與蔣介石相見，毛澤東等則在這天下午再次電勸張國燾，誠懇希望他早日歸來，一切事情均可商談。哪知在次日，張國燾書面聲明脫離共產黨。幾番電文往來，毛澤東知張國燾脫離中共之心已堅，要想勸回已不可能，乃在四月十九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毛澤東對此作了說明：「張國燾對共產黨路線發生動搖，私自跑到國民黨那裡去，並聲明脫離共產黨，因此開除他的黨籍。」²

那麼，張國燾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為什麼要背叛共產黨呢？對此，時任邊區秘書長的伍修權在其回憶錄中有所涉及：

「由於統戰工作開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託去西安代表我黨中央進行統戰工作，邊區政府主席職務就由張國燾代理。我被任命為邊區政府的秘書長……其中也確有這麼個含意，看張國燾是否搞鬼」，「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相戒備，心照不宣。張國燾對工作很不起勁，不

¹ 轉引自路海江：《張國燾傳記和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一七八頁。

²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六六頁。

大管事兒。」¹

張國燾則是這樣說的：

「中共是變了質，完全變了質，離我這個創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萬八千里……至於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黨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

「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考慮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由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分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²

¹ 《中共黨史資料》第二輯，第一九二頁。

²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二八頁。

在這裡，要稍稍梳理辨析研究者們包括張國燾本人相關節點失誤。如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述說：四月四日，掃墓一結束，他（張國燾）說到西安有事，要陪同來的人先回延安。他只帶了一個警衛員，自己鑽進國民黨西北綏署主任蔣鼎文的汽車裡，去了西安。」張國燾的回憶說是「四月四日前往」，可以理解成這天從延安出發，也可以理解成這天到達中部縣。

查一九三八年清明節為西曆四月五日，國民黨中央委派蔣鼎文主祭並宣讀祭文，前已述祭文開頭曰：「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特派委員蔣鼎文代表謹具牲醴鮮花之儀，致祭於我民族始祖黃帝之靈……」顯見「祭黃帝陵」正文中載明祭掃之日期為四月五日。這篇原始祭文是第一手原始資料，不屬多年後的回憶。作為中央一級的祭文，其宣讀的時間自與祭掃之日相對應，無提前或延後之必要。推開來說，提前或滯後均是對「始祖黃帝」的不敬、不誠，也會使同祭者反胃。

張國燾所說「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的說法也不確。查前後幾年祭掃黃帝陵之日均不相同，如一九三七年為四月四日，一九三九年為四月六日，這些日期亦對應地反映在同一年的中央政府祭文中。

再說，延安與中部縣相距二百公里左右，當中要穿越甘泉、鄜縣、洛川才能抵達中部，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當日趕到黃帝陵致祭，幾乎不大可能。或而有可能是張國燾離開延安是四月四日，而在中部縣祭掃則是次日。對這，下文所引蔣鼎文的口述中「某日黎明」句也可側面印證。

至於張國燾脫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的方式和時間，蔣鼎文在「訪談」中也有所提到：

張國燾的出奔脫離共產黨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間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黃帝陵寢，中共也派代表張國燾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進來一個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稱是張國燾，要我保護他的生命安全。我身當方面之任，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一面予以撫慰，一面打電報給戴雨農，由戴雨農把他接了去。¹

竊以為，梳理張國燾的脫逃日期及方式，應當正視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黃帝陵的原始祭文及當事人蔣鼎文的說法，再與張國燾之說印證。

張國燾脫離共產黨並不是像有些研究者所說是蔣鼎文和戴笠策劃的，而是蔣鼎文答應接納張國燾後，張才有可能離開中部縣去西安再轉武漢的。顯然，張國燾是前些日搭乘蔣鼎文的小車回到西安的。

不少書籍說蔣鼎文時任「西北綏署主任」，也不確，其時沒有西北綏署一說，蔣鼎文所任為「西安行營主任」之職。

再回過頭來敘述張國燾脫黨之事，張國燾的不期然出走，對中共帶來巨大影響，也使已經摩擦不斷的兩黨關係緊張加劇。五月二日張國燾公開發表《告國人書》，稱：「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張國燾批評共產黨僅是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實際上仍然因循其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之利益」，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九頁。

「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遊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圖發展」，「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

張國燾在這裡所說的正是其時國民黨指責共產黨的話，而這些話通過一個曾經的重要的共產黨領導人之口說出來，其作用、其影響實為國民黨反共推波助瀾，起到對立彼方無法起到作用。

還在張國燾初到西安之日，張就與蔣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長談。張向蔣提供了共產黨的一些內情和現時中共對付國民黨的相關政策和手法。這「第一手的情報」是蔣鼎文這個延安「鄰居」乃至蔣介石怎麼也不可能瞭解到的。為此，蔣鼎文據張國燾所述，馬上相應地調整了應對策略。臺灣史學家吳相湘是如此評述的：

由於張（國燾）的口述，蔣（鼎文）因更進一步認識中共假藉抗日以擴充其力量的企圖，為防制共黨利用民眾滲透陝西民間，蔣（鼎文）下令限期將此種組織澈底肅清，同時組織陝西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積極領導民間各種組織，收效甚宏。後來重慶以及各省類似組織都是接受蔣這些經驗的產品，共黨因之以「磨擦專家」加之於蔣鼎文。¹

為消除張國燾出走引起的影響，中共採取了相應措施，毛澤東特別強調：

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

1 《蔣鼎文平亂釋疑》，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四冊第一八五頁，臺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七一年版。

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避免再發生張國燾事件。¹

張國燾脫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懷抱固然影響深遠，然放到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片樹葉輕輕飄下，零落成泥碾作塵也。

四、出任省主席前後

陝西省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毋庸多說，但自南宋以後，隨著經濟重心的日漸南移，陝西在經濟、政治、戰略上的位置漸漸退出前列。進入近代以後，特別是隨著抗日戰爭態勢的發展，又使陝西省的戰略位置重新顯現。

陝西南控巴蜀，西連甘新，北通邊塞，東鉗中原，既有周邊山川險峻可依憑，又有八百里關中平原任驅馳，為可攻可守之地。而其時的陝西政治勢力分布情況錯綜複雜：陝甘寧邊區為中共八路軍武裝所事實控制，且有日漸擴大之勢；日本侵略軍已佔據山西大部，兵鋒逼臨黃河，與中國軍隊隔江對峙；寧夏、青海、甘肅一帶的回馬武裝遊牧成性，難以捉摸，合則回應，不合則呼嘯而去；省境之內，土匪成群，劫奪成性，已成多年頑習；國民政府首都避遷於重慶，而首都的拱衛、北出南進，陝西省是唯一通道。

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是楊虎城舊部，為楊一手提拔，兩人關係密切；重要的是孫還參加

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五二八頁。

過西安事變，與中共有過聯絡，且關係一直不錯。在當時情況下，孫蔚如若再與中共秘密接觸，則完全有可能後院起火。

所以，如何控制住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是蔣介石絞盡腦汁思考的問題；而要有效且合法地控制住，改組陝西省政府就是必下之棋。

蔣介石於是想到了蔣鼎文，由蔣鼎文以西安行營主任再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對陝西省政府的改組也交蔣鼎文去完成。蔣鼎文到陝西已有近一年時光，對周邊環境、內部人事，特別是對蔣介石所考慮的事情熟悉瞭解，而蔣介石對蔣鼎文這一年來的工作滿意有加。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蔣介石直截了當地給蔣鼎文發出了一個電文：關於「陝省主席擬由兄兼任，至孫蔚如專任軍長或調中央任用，對於省委人選應多用陝人，除財政廳外似不多更動為宜。應如何布置防範務限星期日前詳覆」。¹對於此事，「二蔣」大概事先溝通過，所以蔣鼎文並未感到突然。然而當蔣介石真正電令讓他受命上任之際，蔣鼎文還是有自己的想法，於是在次日，也即六月十一日，他即電覆蔣介石：

灰電奉悉。一、依目前陝省狀況中央收回政權確屬必要，惟繼任人選需十分精幹方能為有。職不按（諳）政治為鈞座所深知，況陝省環境特殊，實非職所能勝任，職意最好請岳軍（張群）兄來陝，否則則其能與職合作者均好。職之避嫌非有他意，實固才力勿勝，鈞座知之深當能鑒其愚誠。如鈞座必欲責以陝政，職亦不敢再辭，惟求免任過渡，仍祈選能以代耳。二、步驟與部署：（一）乞先電程（潛）長官照原訂計畫調曹、李等三師來陝，擬以一師駐咸陽，二師分

1 轉引自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臺灣《中正歷史學刊》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駐華陰、大荔一帶接河防並策萬一。(二)查近三日內均有歐機，可招孫(蔚如)赴武漢面加溫諭，免其不歡。(三)孫去職後擬請任以軍團長並兼一副總司令名義使其赴山西戰場參戰，若調任往其他戰場或調任中央恐亦非所宜。(四)陝警加三十八軍教團共九團，最好編為三團兩師分屬西安、漢中兩警備司令，該兩司令均係陝籍黃埔一期生，忠實可靠，分割一半邊(編)兩旅分屬指揮亦可，如均不可能任其帶去可也，此事擬請鈞座與孫(蔚如)面洽。(五)如一定令職兼任則廳委擬暫不動，惟財、民兩廳將來必須調動，請物色人選以接替。(六)反應(映)楊虎城離陝時曾散發金錢數百萬，勾結青年及地方團隊保甲，孫去後零星土匪之蠢動定屬難免，其他想可無慮，是否有當定乞查核。¹

這個電報有如下實質性的內容：

第一，收回陝西省政權是必要的，但他不是政治長才，面對陝西的特殊情況，希望不要派他任省主席，建議由張群(嶽軍)來任或其他能與其合作者均可。蔣鼎文這種實名舉薦他人的推卻，當非虛情假意；

第二，眼前陝西的現實，須增調三個師來加強力量，布防在黃河西岸華陰、大荔一帶，嚴防日軍渡河；

第三，孫蔚如去職後的安排最好能讓他職得其所；

第四，孫蔚如原屬三十八軍調離和改造方案建議；

¹ 轉引自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臺灣《中正歷史學刊》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第五，如一定要讓他出任省主席，他只能「過渡」，然財政、民政二廳的廳長要調動，請物色人選以接替。

對於蔣鼎文所提出的問題，蔣介石當日就予以定奪。

增派三個師的問題，他電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蔣介石兼）程潛：「抽撥三個師速開潼關、華陰，歸蔣鼎文指揮，務請勿延。」

孫蔚如的調動問題，改任孫為軍團長，並讓他到山西前線指揮其所部抗日。

然最重要的省主席職務問題，蔣介石沒有接受蔣鼎文的推辭和提議人選，而是告知蔣鼎文：「陝事定明日（六月十四日）發表……請兄準備接令後，即就職勿延。」¹

至於財政廳長之職可任用「政治經驗能力甚豐」的王德溥，其餘暫不要動。

事實上，在這之前，蔣鼎文已以西安行營主任身分秉承蔣介石的意圖，把他們認為不可靠的由楊虎城十七路軍改編而來的三十八軍調至山西布防參戰。但對留陝餘部仍有擔心，故蔣鼎文又電告蔣介石：

查三十八軍以往歷史素極複雜，現時環境又復惡劣，職恐長此以往迷入歧途，曾多方設法誘導糾正其納諸正軌，詎奈積習已深，一時未能完全矯正，前於該師東渡之時，曾密電請俊如（衛立煌）兄對運用該部各師需逐漸東移，使與陝方隔絕，俾脫離其舊日環境以免被人利用，其駐陝警備各旅亦以深入惡化，正密切注意行動中。

1 轉引自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臺灣《中正歷史學刊》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也許孫蔚如聽到了省政府改組的風聲，他為專事軍職，並就地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隊，因而他要求蔣鼎文將入晉三十八軍所部調回陝境，但為蔣鼎文所拒絕。蔣鼎文向蔣介石提出建議：

孫蔚如擬請調回十七、一七七兩師及第八路軍在晉各師，已予拒絕，並可不必補充一七七師槍械。一、孫蔚如屢表示如能將十七師、一七七師仍調回陝境守衛潼關以北黃河沿岸，並將第八路在晉各師南調晉南牽制，則敵不易渡河。職已答恐二戰區不允如此抽掉，閻先生處亦不便啟齒，婉為拒絕。如果依其所請，則西北即入共黨、孫蔚如之手。二、聞鈞座已允補充一七七師步槍一千枝，職認為可不必乞。¹

可見，「二蔣」對孫蔚如部處處提防，因為孫與中共是「朋友」，孫蔚如自己也說過：「我與中共朋友關係，時遠時近，並無隔閡，絕不敵對。」²

僅僅三天之內，「二蔣」在陝西省人事改組方面、軍隊調動方面、二任省主席的職位安排方面即告完成，顯示出蔣介石對改組陝西省政府心情之迫切，動作之迅速。而這一次改組，澈底完成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善後之時未完成的心願，即將西北軍調離發家之地，讓他們不再在本地「興風作浪」，同時又「斬斷」其與中共之聯繫。

¹ 轉引自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臺灣《中正歷史學刊》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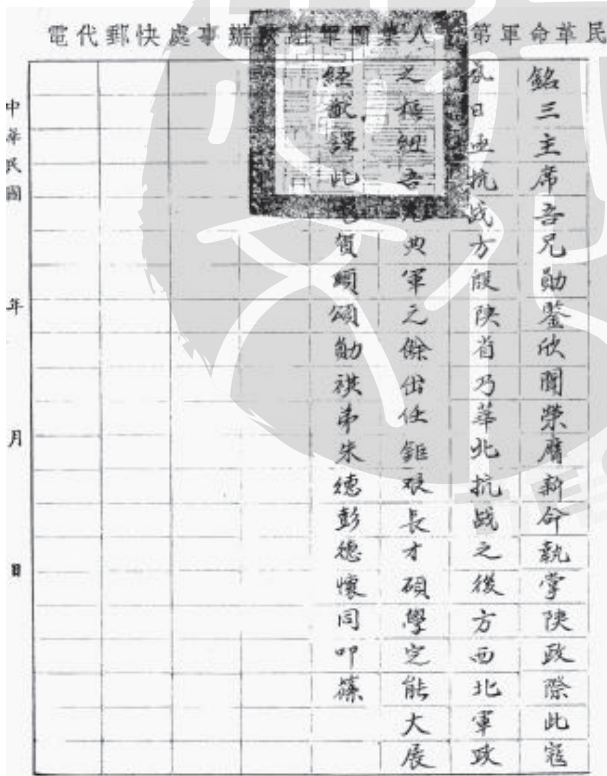
² 孫蔚如：《我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八二二頁。

省府改組在六月分就告完成，但就職典禮卻放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選擇抗戰開始一周年這一天當然頗含深意，意味著新班子矢志抗日之決心。

就職這一天，賀電雪片般飛來，中央大員及各方諸侯孔祥熙、陳立夫、居正、何應欽、顧祝同、朱紹良、俞飛鵬、何鍵、陳儀、陳焯、張道藩、陳調元等等自不必多說，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代表，也是其友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賀電，全文如下：

銘三主席吾兄勳鑒：欣聞

榮膺新命，執掌陝政。際此寇氛日亟，抗戰方殷，陝省乃華北抗戰之後方，西北軍政之樞紐。吾兄典軍之餘，出任鉅艱，長才碩學，定能大展經猷。謹此電賀，順頌勳祺。弟朱德、彭德懷同叩篠。¹



朱德、彭德懷電賀蔣鼎文兼任陝西省主席

¹ 陝西省檔案館藏民國陝西省政府檔案。

新一屆省政府委員計十四人：蔣鼎文、彭昭賢、王德溥、周伯敏、雷寶華、王宗山、杜斌丞、韓光琦、張炯、王捷三、孫紹宗、劉治洲、周介春、李志剛，秘書長初為李志剛，至一九三九年一月為彭昭賢接任。省主要廳局長為：民政廳長彭昭賢，財政廳長王德溥，建設廳長雷寶華，教育廳長周伯敏，保安處長孫坤生，衛生處長王侃。除了財政廳長一職遵照蔣介石之令予以更改外，其他全係孫蔚如時所任廳局長，而孫主政時的九名省府委員，蔣鼎文亦留用了五人，可見對原有的陝西省政府班子未作全域性的變動。

顯然，孫蔚如的調離是非正常的，孫從一九三七年三月上任，至次年六月分去職，僅一年三個月時間；而此前于右任、楊虎城、邵力子任職期限，一般都是三年一個任期。

當陝西省政府改組完成以後，蔣鼎文報了一個改革計畫給蔣介石，認為作為與中共



蔣鼎文（中）與中國國民黨陝西省執行委員會第一屆全體委員合影

相鄰的政權須在政治上、經濟上均有新的氣象。蔣介石對蔣鼎文期望甚殷，同時要他力戒「前省府之舊例」。蔣介石的電文如下：

省府改組以後，務望兄等同心戮力，澈底改革政治，忍苦耐勞，發揮革命精神。務期三月內對於社會組織、經濟建設與教育基礎皆能照整個計畫實現，樹立最新之模範省區，首在自主席起任勞任怨，夜以繼日從公服務，使全省公務人員精神完全改變，而以剷除貪污、肅清土匪、整頓教育、確保治安為入手之道，兄等長才諒能按日計程實現主義，不負望也。

凡自陝北與西安來漢者，皆稱陝北勤勞節儉，苦幹硬幹；而西安則浪費奢侈，遲鈍貽誤，官氣惡習在在皆是，毫無戰時與革命氣象，聞之痛心。亟應改革急進，以挽墮風……若必欲照從前省府之舊例，則何必要有今日之改組？故每月公費仍不得超過三千元為要。愛民簡用，吾人報國安心者，為此而已。¹

可見蔣介石要蔣鼎文務必搞出與相鄰的中共陝北政權勤勞節儉、革命氣象相媲美的公務機關來，同時限定他們的每月公費開支「不得超過三千元」，這讓蔣鼎文勉為其難。

從特定的角度看，蔣鼎文的省政府以及集黨政軍於一身的蔣鼎文班子貢獻不小：

一、抵抗日軍侵略方面，將重兵布防於沿黃河之側的新安、韓城、禹門一帶，建有水泥碉堡

¹ 轉引自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臺灣《中正歷史學刊》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一百七十多個；於洛河西岸及臨潼、高陵、三原之線構築中間陣地；於秦嶺山脈各山口隘路，構築側面陣地；以西安、咸陽為重要據點，不稍任何懈怠。事實也如此，整個抗戰期間日軍未能跨過黃河，保障了關中地區乃至陪都所在巴蜀地區的安全，使陝西省既是抗戰前線、又是抗戰後方的戰略地位得到充分凸顯。

二、蜜月期的國共兩黨精誠合作，奮起抗日，撥款撥槍，乃至互相酬唱，氣氛融洽。龍雲在《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中記述了這樣一樁趣事：蔣介石宣布抗戰後，召集各省軍政長官到南京開國防會議。龍雲接電後，乘專機赴京至西安中轉，在機場休息，蔣鼎文徵詢龍雲：「中共有幾位負責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飛機，可否搭你的專機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

龍雲問他是哪幾位。蔣鼎文告知是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龍雲欣然答應：「當然歡迎，我們一齊去好了。」可見蔣鼎文以陝西主人的身分為中共主要負責人提供方便。還有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蔣鼎文答應周恩來的要求，將關押在西安行營的二百四十多名紅軍西路軍幹部釋放，其中營級以上軍事幹部有三十多人。到了矛盾初現時，蔣鼎文採用以組織對組織、以思想對思想、以行動對行動的積極方式與共產黨爭奪民眾，還下達四項指示給各部門：組織號召青年方面不能輸於共產黨人，但不要為淵驅魚；經費方面如中央不足，可動用行營公費；各有關單位必須協同、各責任人必須分層負責，大膽放心工作；如果按照上述做了，到時有任何行政責任，由他本人負責。

除此以外，蔣鼎文還要求陝西黨政機關直接與共產黨接觸，即不但要爭取「民眾」，還要爭取「共產黨」。蔣鼎文對陝西省黨部與中共軟性接觸、硬性防堵曾有一句名言：「在現有政治條件下，

與匪黨分子接觸即是進攻，隔絕顯示退守。」¹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降，國共兩黨直接摩擦增多，蔣鼎文採取封鎖陝北，限制中共發展的策略。抗戰期間，西安為主的關中地區，中共未能有效進展，而山西、河北則大為發展。

三、陝甘寧邊區問題，國民黨和共產黨多年爭執未止，在若干地盤上互有進退，雖未達成共識，一時也未釀成大的干戈，抗戰期間雙方大體相安無事。

四、經濟發展方面，創辦了許多紡織廠、麵粉廠、制革廠、製藥廠、化工廠等等。大量種植棉花，使當時之陝西成為中國軍隊被服供應的重點基地。

五、水利疏浚和保證糧食供應。關中地區沃野千里，河渠縱橫。然自清季以來，由於忽視水利，致使河渠淤塞，灌溉不暢，農田大量拋荒，有的地方甚至顆粒無收。蔣鼎文主政後，多次指令各地區，務須疏浚河道，解決農田灌溉，從而使織渠、惠渠、洛渠、黑惠渠等乾涸的河流重現流水。水利暢通後，全省多年豐產。糧食供應方面，整個抗戰期間，陝西省供應糧食約占全國五分之一，除了負擔在陝人數眾多的軍人食糧之外，還供應了鄰近的湖北、河北、山西等省區。為加強管理，蔣鼎文在報經行政院同意以後，還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增設糧食局，首任局長為曾任省政府秘書長的李志剛，可見地位之重要。

六、重要的兵員來源地。自一九三七年十月開始，陝西省每月徵集兵員一萬人，且往往超額，抗戰八年總共從陝西省徵集兵員一百一十萬人。這還不包括志願常備兵、編練國民兵、保安團等地方和預備兵源。

¹ 郭紫峻：《蔣上將銘公的宏毅精神》，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八九頁。

七、北聯「回馬」方面，蔣鼎文亦張弛有度，分寸拿捏到位，既與他們信使往返，還不時跑到他們的區域考察，籠絡感情，宣講政策。「西北五馬」與蔣鼎文私人感情亦甚為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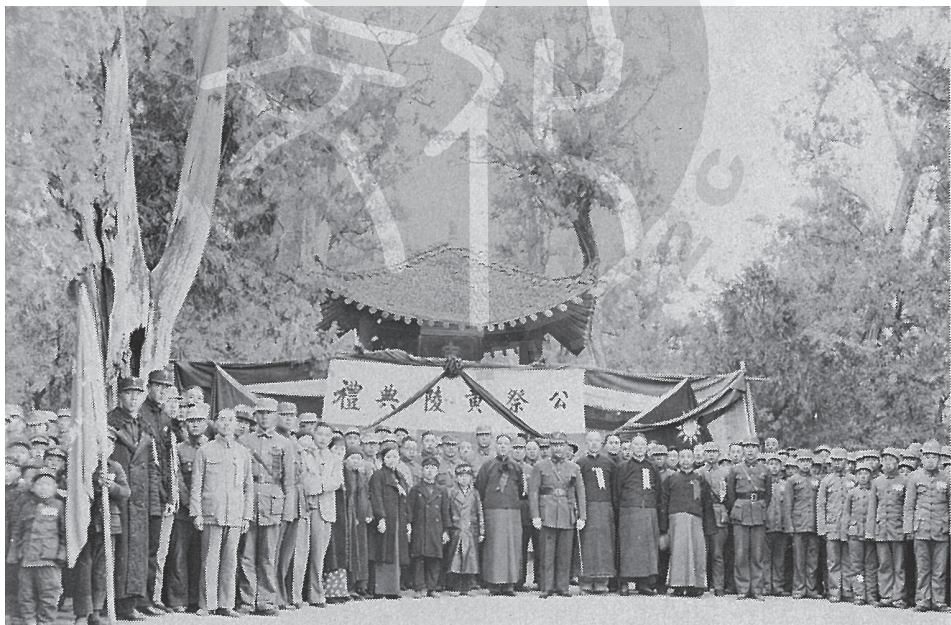
八、蔣鼎文還首創「民運指導委員會」，在各縣設立分會，類似於半官半民組織，既宣傳抗日，又推行政府政策的施行和落實，如政令實施、戶口清查、保甲編組等等。當然這也是他們嚴防中共在民眾中發展宣傳的具體策略之一。故而這種「民運」組織深得蔣介石欣賞，並在全國推廣。

九、嚴厲的禁煙措施。剷除煙苗，禁止販賣，嚴禁吸毒，已吸者限期戒除，凡有違反，法律懲處。在民政廳設有專科管理外，還在省府設禁煙處。此前，陝西省種煙販煙甚為普遍，鳳縣、留壩、略陽、佛坪、鎮巴、石泉、鎮安等縣都種植罌粟，有些甚至種到長城腳下。吸食者更眾，連陝西省高等法院院長黨積齡也是癮君子。蔣鼎文下令，凡抗令者一律逮捕，黨亦成了階下之囚，直到國民黨監察院長于右任出面擔保具結後才予釋放。

十、肅清土匪，平定地方，整編後統一參加對日抗戰。陝西的土匪由來已久，他們掠人劫錢，行蹤飄忽，呼嘯而來，滿載而去。歷任地方政府既恨又怕，莫可奈何，聽之任之的態度使各路土匪更加肆無忌憚，且愈演愈烈，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對如何平定土匪，蔣鼎文是有經驗的，因為早在三年前，他就在福建成功實施過。他在陝西施行的也是「先撫後剿」的招安辦法。蔣鼎文是軍人，所以有膽量，他親自深入土匪所占區域，找土匪頭領談心，曉以民族大義和利害關係，力勸他們不要打家劫舍，而應該參加抗日，由此收編招安不少土匪組成保安團。這些保安團既成了抗日的補充力量，當然也是反共的補充武裝。其中陝西慣匪王三春，任憑蔣鼎文如何勸說，就是不接受「招安」。於是蔣鼎文採用「誘圍」的辦法，動用三個團的力量，具體由預備師師長，也是其第九師的老部下

謝輔三負責，採取武力清剿，生擒王三春，把危害多年，長期在陝西、甘肅、綏遠、寧夏幾省流竄的這股強大的悍匪肅清，一時甚得民望。

十一、修復以及祭祀黃帝陵。蔣鼎文出任省政府主席之時，黃帝陵廟已「殿宇多圯」。一九三九年秋，他責成建設廳撥款派員，同時讓第三行政督察專員鐘相毓、中部縣長盧仁山，合力限時完成，黃帝陵重修費時七個多月。至完成時，「遠眺山陵，近瞻清廟，一草一木，亦煥然增新」。蔣鼎文撰寫了《重修黃帝陵廟碑記》，同時又題額「軒轅廟」，此三字至今高懸在黃帝陵廟大門口處。蔣鼎文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代表國民黨中央，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分別代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在黃帝陵前致祭，表達炎黃子



一九四〇年民族掃墓節蔣鼎文（中）等祭黃帝陵合影

孫的心聲。其時，代表陝甘寧邊區政府陪祭的，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為張國燾，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為林祖涵、高崗等。從現有資料看，蔣鼎文主陝期間，是祭掃黃帝陵香火鼎盛之時。

臺灣學者劉緯道先生評論說：「改組後的陝西（省政府）對抗戰貢獻良多，無論在第一線對抗或在物資人力支援上都有極佳表現。」¹

當然，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鼎文，對阻止共產黨壯大亦是不遺餘力，他曾指示部下，對共產黨工作要追求效果，要放膽阻止共產黨壯大，如有任何行政責任，由他一人承擔，可謂豪氣干雲。

五、與彭昭賢、胡宗南相得益彰

蔣鼎文在陝西省主持軍政期間，用活了一文一武兩個人，文為彭昭賢，武為胡宗南。

彭昭賢，字君頤，山東牟平人。雖比蔣鼎文小二歲，但軍政資歷一點不比蔣鼎文淺。他畢業於北京大學，其後赴莫斯科大學就讀，與劉少奇同學，交往過從甚密，私交不錯，後兩人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在孫蔚如主政陝西省時，彭昭賢任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此前他曾任中國政府駐蘇聯伯力總領事、國民政府內政部統計司司長、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國民黨組織部設計委員以蔣鼎文任省府主席以後，初沿用上屆政府秘書長李志剛，半年以後，他決定啟用彭昭賢出任省府秘書長，蔣鼎文認為彭應事不苟，持正不阿，綜合協調能力、法律施政能力較強，讓他任省府秘書長，對其時繁重的省政工作具有很大的作用。

¹ 轉引自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臺灣《中正歷史學刊》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彭昭賢還比較有政聲，西安事變時他亦被扣，後獲釋。對於彭昭賢離開西安的經過，當時《中央日報》駐陝記者唐君如在報導西安事變全過程的文章中有一段提到：

蔣委員長離陝後，在西安寓居之各要人原應恢復自由……次日，張來電，請速送各要人返京，各要人始得自由行動……至二十七日晨，適為歐亞機班期，事前由軍部交通處將全機包租，不得售票。陝西民政廳長彭昭賢原擬乘該機返京，但以飛機坐滿，未能預定。緣彭氏在陝省民政年餘，平時除月支百二十薪俸外，辦公費節餘均歸公，故事變時雖未被搶劫，而所存僅大洋百餘元。在事變期內復用去一部，只餘三十餘元，不得不早日離陝也。其所持飛機票，係醫生陸仲安赴陝為財長寧升三醫病所購之來回票。因陸氏不能久留陝，於前數日陸路經由大荔赴潼，故彭氏得用該票。陝省府方面，聞知彭氏路費欠缺，曾由代主席王一山送往三百元，彭氏以陝省財政困難，堅辭不受。民廳全體職員復集款二百餘元獻彭，亦經謝卻。至二十七日晨，適由洛派飛機一架往迎錢大鈞氏，彭氏乃得搭乘歐亞機飛京。¹蔣鼎文是這樣回憶使用彭昭賢的：

在陝西省政府時代，我的重要助手是彭昭賢，其實他與我之間毫無歷史淵源……一般人說他是CC分子，我根本不介意這些，究竟他是不是CC，我到現在都不太清楚。我因為他有學問、精明幹練，做事情有魄力、有才幹，對於陝西情況又熟悉，所以我就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之後，仍請他擔任省政府秘書長，統籌管理省政。因為我兼省黨部主任委員又兼西安行營主任，事情

1 李立編著：《親歷西安事變》，團結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二五四頁。

比較忙碌，對於省政事項幾乎都尊重彭昭賢意見。¹

彭昭賢也不負所托，對省府的工作安排得條理分明，大大減輕了蔣鼎文的工作壓力。當然，蔣、彭二人在工作中也不乏分歧。兩人之間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肅清土匪、安定地方是當時省政府工作的一項重大任務，其中對陝、甘、綏、寧邊境王三春這股實力強勁的土匪，他們幾次清剿均未成功，往往被其利用熟悉地形逃脫。負責主管剿匪的謝輔三師長向蔣鼎文建議，在秦嶺山脈中的一個匪巢重點縣分，派一個有軍事經驗且可靠的人去出任縣長，讓他時時注意土匪的行蹤動向，一旦有異，即行上報。蔣鼎文一聽對剿匪有利，即准其意見，下了委任條子。蔣鼎文還認為，非常時期，省主席要委任縣長，下達個條子，作為省政府的秘書長照辦就是了。但彭昭賢知道後，竟當著蔣鼎文面，認為這樣做不符合行政制度，讓他先收回委任條子，然後再由省府依照程序委任，還說這是對事不對人。蔣鼎文是職業軍人，下級須服從上級命令的意識不由自主地湧現，他不肯收回，心想哪有下級抗拒上級之命的。再說這樣做，豈不是拂了他這個省主席的面子，於是兩人爭吵起來。彭昭賢見蔣對他依法行政的意見置之不理，竟立馬辭職而去。

蔣鼎文意識到這就是行政和軍事的區別，他把軍事上無條件執行命令移用到行政上來了。於是他馬上找回彭昭賢，先收回成命，再按照程式委任，尊重彭昭賢他們所創設的制度。

經過這段插曲，他們之間的關係不疏反密，兩人配合日趨默契，且私誼非同一般，如蔣鼎文的生日是寒冬臘月，而身體稟賦特異的彭昭賢，竟親自潛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為蔣鼎文捕撈活魚助興。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六頁。

蔣鼎文他調後，兩人還是往來頻繁。其後彭昭賢官升高位，直至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黨部組織部副部長、內政部部長、中央執監委員，兩人依然交稱莫逆。一九四八年，彭昭賢結婚，非要請蔣鼎文做證婚人不可，即使蔣鼎文因開國大代表會議未能到場，彭還執意要請蔣鼎文在證婚人處蓋上私章，另請他人代蔣宣讀。

如果說彭昭賢是蔣鼎文在任上才相知相熟的，那麼他與胡宗南的師生情誼、上下級關係就非一朝一夕了。

胡宗南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深受蔣介石的器重，這點無疑。但胡同時也是蔣鼎文的學生，蔣鼎文對胡多次提攜乃至庇護、偏愛，也毋庸置疑，而這點過去書籍少有提及。如對胡宗南最關鍵一級提拔（即從副師長到師長）之時，正是蔣介石第一次下野赴日考察期間，至今沒有史料證明提拔胡宗南是蔣介石的意見，胡宗南的提拔實是蔣鼎文的主意，何應欽批准。對於這一「保薦」，倒是胡宗南夫人，也是博士出身的胡葉霞翟撰有文章：他對先夫宗南幾十年的愛護與關切……特別是北伐時期，打蚌埠那一仗，那時蔣（鼎文）老師任第一師師長，南兄任副師長，當時軍情極為緊急，但在老師的指揮調度之下，將士用命，他們打了個大勝仗，最高統帥欣慰之餘，命老師保薦一位人才任第二十二師師長，老師當即力舉南兄充任。由於老師的賞識和獎掖，南兄深受感召，從此更加奮勉……可說蚌埠之役是一關鍵。¹

由此開始，胡宗南成為黃埔第一期學生中最早獨當一面指揮作戰之將領，事後連蔣介石也承認胡宗南是蔣鼎文發現提拔的。

1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九五—九六頁，臺灣一九七六年刊行。

當蔣鼎文出任西安行營主任之後，他向蔣介石力薦，把胡宗南部放到他的西安行營屬下。其時胡宗南的處境略顯落魄，並非春風得意。

事情是這樣的，淞滬抗戰爆發後，駐守在徐州胡宗南的第一軍接蔣介石命令趕赴上海，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旬起在楊行、吳淞、江灣一線，與原駐守在此的陳誠所部楊步飛的第六十一師、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師合力抗敵。在楊行血戰中，胡宗南所部傷亡慘重。其後胡部逐次退至南京北岸，本擬參加南京保衛戰，但奉命西撤，至十二月底途經泰州、阜陽、潢川等，到次年一月初，抵達河南信陽待命。西撤安徽境內時，蔣介石將胡部撥歸第五戰區李宗仁指揮。

胡宗南第一軍由於經過血戰，來不及補充軍力，幾成殘軍，再加又是失敗之將，情緒顯得低落，而讓他屬非中央軍將領李宗仁指揮，心中實有不甘，因而胡連部隊的開拔線路都不向李宗仁報告。李宗仁回憶說：

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戰後，自江北撤往蚌埠。蔣先生曾親自告我說，將來撥胡宗南歸五戰區指揮。但是這批「嫡系」中央軍至蚌埠後，也不向我報告。¹

也許在這個時候，胡宗南與蔣鼎文已聯繫上了。因為在河南信陽待命時，蔣介石讓胡宗南的第一軍開到武漢週邊，待機做好守衛武漢的戰事準備。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五六九頁。

而蔣鼎文則向蔣介石力諫，不要讓胡宗南的第一軍去武漢，讓他到陝西來。其主要理由是：

在西邊，日軍已占山西大部，隔黃河而虎視，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特別是他的西安行營下屬部隊只有毛炳文的第十一軍團（實際只有自兼軍長的七十六軍）和孫蔚如任軍團長的第三十一軍團，下轄第三十八軍和第九十六軍，戰鬥力不強，且非中央軍主力部隊，到緊急之時，能不能聽從指揮調遣也很難說。

在北邊，中共改編的國民革命軍雖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但軍令不暢，遊弋不定，其留守武裝不斷地向關中地區滲透，且勢頭猛烈，不得不加以防範。

在南邊，國民政府首都已部分遷往重慶，將來防守保衛川蜀首都之地，陝西自然是北部最重要的門戶屏障之地。

在關中，兵力空虛，亟待增兵布防。胡宗南部為中央軍主力，是可以信賴憑依的力量，加之



中央抗日慰勞團向第十戰區蔣鼎文司令（中間著軍裝者）贈旗典禮攝影紀念

他久居秦隴之地，情況熟悉，如能調胡部進入，則是人地相宜。¹

總之蔣鼎文認為，關中地區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眼下的形勢又是如此錯綜複雜，急需胡宗南第一軍這樣可靠的力量來充實加強。

蔣介石認為蔣鼎文的分析很有道理，乃改變主意，採納了蔣鼎文的建議，在一月中旬，將胡宗南的第一軍從信陽調至陝西，軍部駐西安，由蔣鼎文直接指揮，成為西安行營下轄的最重要軍事力量。自此後，胡宗南在蔣鼎文的提拔和支持下，整頓軍隊，廣招兵馬，迅速充實兵力損失過半的第一軍。胡本人由此步步高升，且所部人數因其駐防位置特殊而得以迅速擴張，以至演變成一個軍事集團。此後至解放戰爭末期，胡宗南部除一九三八年短時期離陝抗日外，其後十多年長期在西北之地攻防，在奮力抗日的同時，亦成為國民黨反共前線的最重要武裝力量。

一九三八年夏，日軍進攻武漢週邊，胡宗南所部當時駐守信陽，歸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指揮。但胡部為保存實力，在面對強敵的進攻之下，未經李宗仁同意，自行撤至南陽，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防守缺口，造成鄂東守軍的極大被動，以至釀成武漢屏障武勝關轉瞬失守的嚴重後果。李宗仁對此十分憤恨：「胡（宗南）氏不聽命令，竟將其全軍七個師向西移動，退保南陽，以致平漢路正面門戶洞開。胡宗南部為蔣先生的『嫡系』部隊，在此戰局緊要關頭，竟致不遵命令，實在不成體統。」²於是，李宗仁上告中央軍委會，要求嚴辦胡宗南。

也許李宗仁並不知道，此時陝甘寧邊區國共兩黨摩擦加劇，新任省主席蔣鼎文秘密向蔣介石告

1 參見經盛鴻《胡宗南大傳》，團結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二八頁。

2 參見《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五六九頁。

急，要求胡部速返關中。十月底，胡宗南率第十七軍團從豫南再返陝西，軍部依然駐西安。

武漢失守後，蔣介石在十二月中旬於西安西部的武功召開軍事會議。與會各方軍事要員有何應欽、蔣鼎文、徐永昌、陳調元、程潛、朱紹良、衛立煌、鹿鐘麟、于學忠等。胡宗南、范漢傑、宋希濂等也參加了會議。

針對當時日本侵略軍的洶洶攻勢，會議分析判斷陝西有可能成為日軍下一個重點進攻區域，乃決定撤銷西安行營，增設第十戰區，戰區司令官由蔣鼎文擔任，胡宗南所部隸第十戰區指揮。

一九三九年一月，蔣介石又將第十七集團軍擴編成第三十四集團軍，由蔣鼎文兼任總司令，胡宗南任副總司令。

自此以後，直至蔣調至河南，胡依然在輔佐蔣鼎文。如「戰時幹部訓練第四團」，由蔣介石兼團長，蔣鼎文為副團長，胡宗南為教育長；「西北遊擊幹部訓練班」，蔣鼎文為教育長，胡宗南為副教育長；「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指揮部總指揮部」，蔣鼎文為總指揮，胡宗南為副總指揮，等等。

其時蔣鼎文身兼八職，不勝其煩。他多次對胡宗南說：「宗南，我這裡實在煩而又忙，三十四集團軍的事由你全部負責，我這頂大涼帽給你頂著。」蔣鼎文以西北軍政長官名義，數度向重慶中央報請任胡宗南為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然胡宗南當年擅自撤守信陽，造成鄂東十多萬大軍被日軍重圍，導致李宗仁憤而狀告至軍委會，此事影響實在太大，故軍委會對蔣鼎文的報告均未予核准：「查該員自抗戰以來，毫無功勳，所請礙難照準。」但蔣鼎文仍不止息，其後到重慶參加軍事委員會時向蔣介石再次面述自己實太繁忙，再三力舉胡宗南扶正，終獲蔣介石首肯。至一九三九年八

月分，蔣鼎文不再兼任，由胡宗南實任正職。¹

蔣、胡都有非常濃厚的地域觀念和鄉情，其時直隸胡宗南手下有不少諸暨籍將領，這些人都有相當的資歷，主要有：

楊彬，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一八九九年出生，浙江諸暨雙橋霞楊村（今屬浣東街道）人。參加過東征北伐，任過第一師營長、浙江省保安團上校團長等職。與邱清泉等人赴德國學習軍事，歸國後在陸軍大學出任戰術教官，後任胡宗南所辦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教育長及第八十八師少將師長。

王繼祥，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生，一九〇四年出生，浙江諸暨陳宅鎮羨塘村人。參加過北伐，歷任連長、營長、團長職。再入陸軍步兵高級班第五期深造，繼任憲兵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第一〇〇軍（軍長陳琪）第八十師少將師長，後與何凌霄（黃埔二期）對調，任軍政部西安第一補訓處處長，胡宗南部第三師師長。

周煦龍，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生，一九〇四年出生，浙江諸暨安華鎮黃藤市村人。參加北伐東路軍，歷任連長、營長、團長職。後又入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三期畢業。旋出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學生總隊少將總隊長。

周天僂，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畢業，一九〇一年出生，浙江諸暨安華鎮豐江周村人。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張秋人介紹參加中共，曾任中共寧波地區黨組織書記，上海閘北區委委員。畢業後參加北伐，任第十一軍團某團黨代表。選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歸國後出任中共廣東省委宣

¹ 參見蔣干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傳部長。後轉向加入復興社，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秘書科長，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團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第七分校政治部少將副主任。

劉釗銘，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生，一九〇六年出生，浙江諸暨湮浦人。參加過二期北伐，任連長、營長，再入陸軍步校及陸軍大學第十三期深造。參與創辦胡宗南的第七分校，分管招生工作，先後任學生總隊少將副總隊長、教導總隊少將團長、軍校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傅維藩，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一九〇七年出生，浙江諸暨店口鎮漁村人。黃埔畢業後又到陸軍大學第十一期就讀畢業。抗戰後任營長、團長，第七分校炮兵大隊長，學員總隊少將總隊長、第十七軍團參謀處處長、一九九師代師長等職。

汪維恒，原名汪益增，一八九六年出生，一九二一年畢業於北洋政府軍需學校第四期，浙江諸暨牌頭鎮寺下張人。一九二四年由張秋人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後在中央軍校漸次升至軍需科科長，深為張治中和經理處長陳良賞識。胡宗南為整頓軍需，向蔣介石要人，蔣要陳良派一有為人才，於是汪就到了胡宗南所部第十七軍團任少將經理處長、第七分校少將經理處長。汪維恒實為中共黨員，他的地下工作連絡人先後為宣俠父、伍雲甫、李克農、潘漢年、史永等。他借國共合作之名，為同鄉、又是中共中央特派員的錢之光採購運輸物資提供極大便利。其後汪維恒升任聯勤總部經理署副署長、代理署長，為共產黨提供過非常重要的軍事情報。汪維恒的真實身分瞞過了蔣鼎文、胡宗南、陳誠，直到解放後，汪出任上海人民政府地政局局長和房地產局局長，臺灣國民黨方面才恍然大悟。汪實是胡宗南、陳誠身邊又一個熊向暉式的人物，由於新中國成立後他的波折太多，所以社會上對他默默無聞的重大貢獻知之甚少。當然這是後話了。

以上這些人，除了汪維恒在公幹層面上不得不敷衍外，其他都是忠心耿耿地在蔣、胡手下賣力地工作。

蔣鼎文與胡宗南的配合，除了共同抗日防止日軍西犯以外，還煞費苦心，想方設法封鎖陝甘寧邊區和阻止共產黨的擴張。

對於中共竭力爭取胡宗南，蔣介石曾有耳聞，在想方設法除掉宣俠父以後，他曾找胡宗南談了一次話，讓其在聽從蔣鼎文的指揮下，給他下達了工作重心，依次是「東禦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懾回馬」¹。

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蔣介石已有了限制陝北中共自由通行的電令，他電示蔣鼎文等人：

據報第八路軍有傷兵兩萬餘人由西安經漢中陸續入川，沿途下車分留各縣，其中多借傷兵名義，而實非傷兵之男女夾雜其間，此事該路軍並未呈請。軍委會之准許決不能當作傷兵看待，應由西安與重慶行營及川康綏署負責查明並實取締，一律遣回西安陝北或逕送漢口，不得令其逗留，或分散各地，以維持後方秩序……以後凡由陝北經過西安或寶雞、潼關之人員，應由西安行營負責查明，不得任意放行為要。²

1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七五頁。

2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蔣鼎文嚴派部隊防範，特別是在出任省主席以後，他即對行政區域有所調整和控制，派出了不少軍人出身，且在西安行營和胡宗南部隊職至師旅長級別的軍官，放到行政督察區出任專員，如富文、何紹南、鐘相毓、杭毅、魏席儒、熊正平、章烈、蔣堅忍等，特別是與陝甘寧相鄰的行政督察區，均安排「文武雙全」之人，以對付中共的擴張。¹

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向來認為，對於在全國創建根據地，發展廣大群眾參加抗日，壯大自己的隊伍，他們有獨立自主的自由，而不是都應經過統一戰線。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應取締限制他們，更不應該封鎖他們的自由進出和自由發展。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次全會上說：

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麼，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²

1 陝西省檔案館民國政府檔案：《民國時期陝西省政府沿革》。

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五四〇頁。

一方要不受地域約束地發展，一方要統一調度地使用和納入行政區域的管理。矛盾不可調和之時，武裝封鎖和監視就出現了。據時在胡宗南部任職的宋希濂回憶，蔣鼎文與胡宗南聯手，重點布防陝甘寧：

自黃河西岸的宜川起經洛川、中部、同官、耀縣與甘肅之鎮原、固原的封鎖線，使用兵力，經常是三至四個軍。這條封鎖線，完全是對付當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的。¹

蔣鼎文之所以這樣做，是根據國民黨中央對中共的發展以「軍事限共為主」的方針調整的。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底，出現了抗戰期間的第一次國共摩擦高潮。蔣鼎文與胡宗南聯手攻下五座縣城，致使蔣鼎文的陝西省政府又多了實際控制區域。

當然，中共亦非逆來順受，從晉綏前線急急抽回王震的三五九旅，既有武裝行動，亦得到實際收益。

對於這場軍事摩擦，蔣介石甚至有更大的軍事準備。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他致電蔣鼎文，稱中共鞏固陝北、向外拓展的圖謀越發明顯，擬調傅作義到榆林具體指揮軍事行動，深淺程度統一由蔣鼎文領導把握。²

1 宋希濂：《鷹犬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九二頁。

2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後終因面對民族強敵，雙方都冷靜下來，重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方針，兩黨一度緊張的關係才趨緩和，但戒備心理始終存在。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再度致電蔣鼎文、朱紹良、胡宗南，應當秘密命令各部，提高警覺，嚴陣以待，「以防共黨對我之襲擊進攻」¹。

蔣鼎文作為與中共直接接觸的國民黨最高軍政領導，再加又是蔣介石在秘密指使，對其中的紛繁感受非其他國民黨要員所能理解，他曾喟然感歎：

共產黨在抗戰期中稱我為「摩擦專家」，連天水行營主任程潛都輕信了。有一次我去重慶述職，在過江的輪渡上與戴季陶先生同船，我說：「共產黨背後有俄國人撐腰，要流我們中國人血來保障俄國利益，將來勢力一天天壯大，以後實在不得了呀！」戴說：「不要如此悲觀，共產黨在荒涼的陝北，餓也能餓死他們。」我說：「我情願他們來到東南來盤據，雖然浙江是我的家鄉，我倒情願被他們統治，只是不願看到中國人來流血，不願看到他們殃民禍國。」以後共產黨果然不顧國家民族，這是西安事變之後我們所未曾想到的。²

對於彭昭賢、胡宗南這兩個人，蔣鼎文對他們評價較高，他們之間的公私私誼亦至死不渝。蔣認為：「彭昭賢是一位識大體、有見解、有為有守之士」³；「胡宗南的確是一個人才，能吃苦耐勞，

1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2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四頁。

3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八頁。

對領袖效忠沒有一點私心，以後的事實證明我的眼光不錯」¹。

縱憑蔣鼎文、胡宗南、彭昭賢這些國民黨精英嚴謹合作、精誠聯手，給中共的發展造成了事實上的困難，他們在國民黨一方，亦贏得讚譽一片，然其所作所為，誠阻擋不了時代潮流所趨。

六、與宣俠父豆萁相煎

自顧祝同率中央軍進入西安接替防務後，東北軍的問題旋之解決，西北軍的隊伍也隨之歸順，至此，西安事變善後事宜基本結束。於是，國共雙方的焦點自然地轉到如何具體談判及落實所達成的共識上來。

中共一方為加強統一戰線的力量，抽調精兵強將會集西安。宣俠父奉周恩來、葉劍英「速來西安」的電示，於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從廣西趕來報到。周恩來即讓他加入葉劍英為團長的紅軍代表團，由此開始，宣俠父利用他廣泛的社會關係對在陝西的國民黨要員和社會名流展開統戰工作。

蔣鼎文雖早已參與對紅軍改編的談判，然真正肩負實職還是七月中旬他出任西安行營主任以後。九月份，宣俠父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少將參議²，以官方的身分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此時的西安和延安，公開或不公開身分的國共雙方諸暨籍人士可謂風雲際會，要人雲集。他們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二五頁。

2 關於宣俠父的軍銜，少將、中將說都有。中將說指的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宣出任馮玉祥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政治部主任；少將指一九三一年蔣介石委派宣為軍委會少將參議，一九三七年九月出任第十八集團軍少將參議。一般從少將之說。」

常常有意無意地借助「統戰」之名，碰頭聚會，既交流老鄉情誼，又廣談天下大勢，都認為須為民族存亡而努力，當然他們也為各自政黨的鞏固和發展盡賣力工作。

雙方的陣容是這樣的：

國民黨方面：西安行營主任兼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省政府參議員徐逸樵、錢西樵、壽家駿、黃懿範，省會公安局長孫謀，西安行營總務處長朱品（平）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西安市黨部書記長周心萬，西安行營參議余重耀、主任秘書俞銓，西安行營聯運所主任何國亮等；還有前述的師旅長級的高級軍官楊彬、王繼祥、周煦龍、汪維恒、汪益堃、傅維藩、劉釗銘等，其中汪氏兄弟實為中共地下黨員。

共產黨方面：中央青工委書記馮文彬，陝北特區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陝甘寧邊區交際處處長金城（金樹棟），邊區政府國民經濟部秘書長會計科長毛澤民夫人錢希均，嶄露頭角的青年才俊余宗彥、吳江等；在西安「八辦」工作的宣俠父、金鈴夫婦，以及協助他們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金樹望（王文源）；以《西京文化日報》記者、編輯職業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壽松濤、邊雪峰等。

還有實際分不明，原為中共早期黨員，時為國民黨的政治文化名人周天謬、張以民（張從仁）等。周、張兩人視野開闊，知識淵博，縱論國際形勢頭頭是道，聽者甚眾，實是當時西安救亡圖存宣傳中風頭正勁的聞人。

雖然雙方人員眾多，但國民黨方面無疑以蔣鼎文為代表，而共產黨方面宣俠父利用公開身分左右協調，新聞文化界則以張以民的身分為高。

馮文彬、錢之光、金城都時常到西安「八辦」，錢後來雖出任南京、武漢「八辦」之職，依然

不時在西安辦事。

客觀地說，在抗戰初期，蔣鼎文為形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為陝甘寧邊區做了一些實質性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蔣鼎文撥給陝甘寧邊區和紅軍經費八萬元，具體由林伯渠負責落實。按照蔣鼎文所說，紅軍改編而成的三個師，「當時給予共產黨的經費是每月五十萬元，以當時的幣值和物價來說，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中央軍整編師每月經費才十一萬元」；蔣鼎文還說，他又做了蔣介石的工作，「有一次我在電話中談到共產黨問題，我建議委員長要放寬度量，拿出誠心給共產黨看，好讓他們能全心全意地抗日」，而「委員長在電話中說：『銘三，我們要當心，不要上共產黨的當。』我那時對共產黨，的確是希望他們能夠……以國家民族為重……所以處處替他們說好話」¹。無疑，對於在第一線與共產黨打交道的最高軍政長官，蔣鼎文的意見在國民黨高層具有極大的影響，有時甚至起決定性的作用。

西安是西北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共在國民黨方面得到的錢款、軍糧、被服、槍械、彈藥以及人員往來、物資運送，都要在這裡進行或者要經此中轉，還有邊區提取現款、自行採購的物資運送等，都需要有良好寬鬆的環境。蔣鼎文與林伯渠關係也還融洽，雙方時常晤談並不時書信往來，蔣鼎文同時還讓林伯渠與其下屬經辦部門接觸，以減少雙方的推諉扯皮。

國共合作初期，蔣鼎文允許中共組織、宣導民眾的機構，公開宣傳自己的抗日救亡圖存方針。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四頁。

「西安文化界協會」、「西安青年救國聯合會」、「西安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等十三個抗日救亡團體，在抗戰初期非常活躍，在宣傳全民抗戰的前途和意義之際，也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後雖被查封，但蔣鼎文還是讓幾家保存下來。

這當中與蔣鼎文接觸聯繫最為密切的是宣俠父。蔣、宣既有師生關係，又具同鄉之情，頗具淵源。自黃埔軍校分別後，兩人在重大問題上既有你反我扶的對抗，也有觀點驚人相同的價值取向。

宣俠父，又名堯火、俠夫，號劍魂，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出生，浙江諸暨紫岩鄉（今店口鎮）長瀾村人，與蔣鼎文的盤山村相距三十多里。宣的父親和祖父以教書和務農為生，清貧正直。宣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賦稟異，書法詩文俱佳。一九一六年夏考入浙江省水產學校漁撈科，以總成績第一名畢業，並於一九二〇年夏公費至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學習。在日本即全身心投入革命思想傳播，後中斷學業，回國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受中共浙江黨組織委派，帶領宣鐵吾、樊崧華等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並聯絡社會上胡宗南、石祖德、陳德法等人，在上海萬隆路國民黨辦事處開出介紹信，趕赴廣州報考黃埔軍校第一期。

宣是「歸國留學生」，文化、識見、才情都比第一期其他同學高出一籌，很快在學校中成為眾望所歸的人物。黃埔軍校開學未及三月，宣不滿國民黨小組長由校長指定的非民主作風（他本人是被指定的小組長），上書蔣介石，讓他不要在黨內開啟獨裁之風，並要他收回成命。蔣不允，堅持己見，而宣亦不妥協，蔣介石下令關他禁閉三天，讓他寫「悔過書」。三天後，蔣介石問他悔過書寫好沒有，宣回答說：「學生無過可悔。」蔣介石即寫好一紙手令給學生隊第二隊長：「該隊學生宣俠父，目無師長，不守軍紀，再三教育，堅拒不受，著即開除學籍，即令離校，以申軍紀，而整

校風。中正。」¹事情鬧大，何應欽領銜教職員共同請求蔣介石從輕處理，蔣鼎文就是其中的求情者之一；黨代表廖仲愷又出面調停，讓宣「委曲求全」，不要拂逆蔣校長的意志；可宣俠父拒不認「錯」，認為「個人事業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風氣，防止獨斷專行作風是大事」，遂從黃埔校門揚長而出。這就是沸沸揚揚的「蔣宣事件」。

宣俠父離開黃埔以後，先後到馮玉祥部出任要職，傳播革命思想，到甘肅創建第一個共產黨組織，資助「左聯」開辦湖風書店，撰寫、出版《西北遠征記》、《入伍前後》兩部書籍，策動吉鴻昌、南漢宸組織反法西斯同盟等，這些都是足以載入中共黨史和文學史的事件。

宣與蔣鼎文緊密關聯的還有兩件大事。

一是蔣鼎文率十五個師在福建鎮壓了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九路軍後，李、蔣、蔡等避走香港，十九路軍被分化改組。不久，宣俠父以中共華南工作委員會書記身分赴香港，策動李、蔣、蔡等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兼任不管部部长，出版《民族戰線》雜誌，宣傳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李、蔣、蔡等最終成為中共的親密盟友，宣俠父功不可沒。「兩廣事變」期間，宣又赴廣西聯合李宗仁、白崇禧成立新的十九路軍，宣還出任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師參謀長。

二是西安事變期間，蔣鼎文為和平解決此事南北奔走、上下斡旋；宣俠父其時正在廣西梧州與李濟深縱論革命形勢。宣、李在十二月十四日深夜獲悉此事後，急忙分析事態發展趨勢，認為以和平解決為上。當得知南京當局出動飛機轟炸西安的消息，兩人心急如焚，聯名給南京當局發了「為

¹ 蔣超雄：《宣俠父鎮江避難》，《縱橫》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了保護蔣總裁的安全，決不可轟炸西安」的緊急電報，同時兩人又致電張學良，讓他一定要「保護蔣總裁的安全，以達一致抗戰」之目的。兩人還不放心，又修書四封，派秘書胡蘭畦專程送至上海宋慶齡、何香凝處，擬請她們赴西安一行；另兩封送至南京的張群、吳稚暉，力陳保護蔣介石安全的重要性。以至數十年後，作為當事者的胡蘭畦感佩不已：「在遙距延安、西安數千公里的南疆邊陲廣西梧州鄉下，宣俠父、李濟深二人在對西安事變如何處理的態度上，和中共中央的決策與方針竟然如此地一致或相近，這足以說明宣、李二人政治上的精明、遠見與卓識。」¹

可見，面對重大政治問題的處理，蔣、宣兩人雖相距遙遠，未有往來，卻心靈相通，識見相同，在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和危機處理上，兩人頗具共同語言。

如今兩人又走到一起來了。

在蔣鼎文未到西安之前，宣就拜會了他的老師顧祝同和黃埔同學宋希濂、曾擴情等。蔣繼任顧祝同之職以後，宣與這位新任西安行營主任聯繫就更方便，接觸也更多，蔣鼎文亦有意無意地告訴宣俠父國民黨中央的考慮和心中的憂慮。

無疑，宣俠父是中共聯繫瞭解蔣鼎文乃至國民黨高層動態的重要管道，同時宣也對蔣鼎文做統戰工作。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宣俠父給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博古、林伯渠發去一分電報，全文

1 《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三六八頁。

2 關於宣俠父其時在共產黨內的職務，據民國國史專家楊奎松書引述，宣俠父為「中共陝西省委重要負責人」（見《國民黨聯共與反共》第四〇三頁）；據時任「八辦」主任伍雲甫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致中央電報反映，當局聲稱「宣俠父為軍委書記」（見《宣俠父詩文集》第四〇八頁）。

如下：

毛、周、洛、博、林：

我昨日由京轉漢返陝，與胡宗南未見面。情報要點如下：

一、李、白於前月號日前方應強，新由日歸國之程志遠與法西聯絡，鄧悌、賀衷寒、康澤等對程表示眼前對內問題嚴重於對外問題，仍然對我們而言。

二、只康熱（澤）表示絕不容我們在長江流域活動，證以蔣對葉挺表示不允許新四軍在江南作戰，似以為法西對我們一種決定。

三、據周天僂等談胡宗南、張發奎、陳誠等有團結抗戰派之企圖。

四、法西對我太壞，老蔣告李濟深勸我們閉命，可見蔣、深、何他們包圍南京政府中有抗日意議者，對國共合作多悲觀失望，周能去南京對老蔣及各方作聯絡解釋，因蔣雲在成見上對周特別好。

五、我日內去見（蔣）鼎文。有何示，可電知。

宣俠父支午

對策。

這份電報清楚地告知中共高層，國民黨內對國共合作的不同意見以及眼前形勢下擬採取的相應過了三天的，宣俠父把與蔣鼎文所談的國共合作情況和蔣的想法彙報給周恩來。因電報中隱含統

戰中毛澤東話語過重及周恩來應跟蔣介石多接觸之意，故此電宣只發給周，全文如下：

副主席恩來兄：

今午晤鼎文，彼表示如下：

一、近來兩黨摩擦甚烈，彼對前途悲觀，謂抗戰前途中如此，將來更難設法。

二、毛主席為陝北團隊事，曾有電給鼎文，有「以後唯你是問」一語，彼覺難堪。

末謂共產黨對我們實在壓迫過勝（甚）。

三、希望你能早日與蔣介石晤面，毛能同行更好，否則摩擦日甚一日。彼又謂只要你經常與蔣在一起，即使下層有摩擦也不要緊。

四、像從前情形，彼亦不能制止部下行動，乃指《解放》社事而言。又盛世才駐京代表趙國元過此問兩事：

A. 新疆擬在陝甘方面招兵，表面或為募工，問我方能否幫助。

B. 我方是否需要手榴彈工人，如要，新疆方面可設法。

宣俠父陽午

宣俠父告知周恩來，雙方摩擦過甚，導致蔣鼎文擔心，認為兩黨合作「前途悲觀」。同時蔣鼎文亦放出話來，「共產黨對我們實在壓迫過甚」。派丁惟汾出掌陝甘寧邊區，是康澤主談，蔣介石之意，他蔣鼎文對此也無能為力。如若過責蔣鼎文，則會引起反彈，希望周多與蔣介石接觸。

宣俠父在接到周恩來覆電後，不到兩天，又去見蔣鼎文，並用報告形式向周恩來轉達蔣鼎文的真實想法。電文如下：

周副主席：

一、今晨遵電示，分三點告鼎文：

甲、他先表示，他固非共產黨員，但亦不認定自己只是國民黨員，而只是對民族國家負責，希望你快出來。

乙、對汪之妥協活動，彼似無聞知，甚驚奇。

丙、我提出《解放》社事，他有難色。他表示：（甲）他對第一次封閉，已勸他們不要這樣做，以免蔣介石操心；（乙）他的下面有力組織，他對此事有困難；（丙）法西方面已把《解放》送國民黨中宣部，主張永遠封閉《解放》社云。我告訴他，外間均傳封閉《解放》係你手令，請他告誡部屬速予啟封，以顧全大局。他允，向任覺伍等解釋後再答覆。

俠一九三七·十二·九¹

此電中「你快出來」，是指蔣介石、蔣鼎文多次電催毛澤東、周恩來赴武漢一談，以解決兩黨出現的摩擦問題；中央《解放》雜誌遭查封一事，時尚未兼任省政府主席及黨部主任委員的蔣鼎文

¹ 《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以上宣俠父給中共的三封電報見第一〇七一—一〇九頁，第三九頁。電報個別文句略為費解，然原文如此。

不知情也有可能，不屬他職責範圍，以後的事實也證明，蔣鼎文對宣俠父的交涉還是認真對待的，不久釋放被捕人員，退還沒收的七千多份《解放》週刊，更重要的是《解放》雜誌社，自此在西安立足，發行全國，這不能不說是宣、蔣的合作成果之一。

宣俠父以統一戰線宣傳者身分名聞西北。時在國民黨政軍兩界任職的甘肅青年軍官任謙對宣俠父早已仰慕，一次特地到西安向宣俠父求教，同時對時下國共合作的摩擦表示擔心，宣俠父告訴他：「國共兩黨好像一家兩兄弟，兄弟之間鬧點矛盾，老大欺侮老二是有常有的事，但在對外時，還是能夠團結一致的。」¹這一番話實是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形象比喻。每當陳賡、左權、曾希聖等來西安時，宣俠父則邀國民黨中的關麟徵、董釗等黃埔同學及馮欽哉、郭紫峻等人共敘友情，暢談國是，雙方既有開懷大笑，也有唇槍舌劍。而當爭得不可開交之時，宣俠父往往恰到好處地把大家引入共同感興趣的話題。

一九三八年三月，女作家丁玲奉第十八集團軍之命，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西安演出，在演出中，國民黨陝西省有關部門以「政治問題」為由，限期「西戰團」離開，丁玲急忙到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交涉，但黨部不予理睬。宣俠父聞知後，找到丁玲，告訴她鬥爭的方式要合適，若以官方的「抗敵後援會」名義出現更妥當些，而演出宣傳內容可以不變。宣俠父還約好蔣鼎文和胡宗南，請蔣鼎文在西安行營長官公署會見了丁玲，同時又請蔣捐款二百元給「西戰團」，蔣的秘書在次日專程送至「西戰團」以示支持演出；胡宗南則請宣俠父、丁玲一起吃中飯。這柔性的兩招傳出去以後，自然

1 《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以上宣俠父給中共的三封電報見第一〇七一—一〇九頁，第三九頁。電報個別文句略為費解，然原文如此。

等於拿到了「護身符」。由於宣的巧妙安排，也由於蔣、胡的配合，「西戰團」在西安演出四個多月，再沒受到干擾，順利地完成了中共所要求的宣傳任務。對於這段歷史，丁玲寫有《回憶宣俠父烈士》一文，予以詳細披露。順便一提的是，丁玲對國共合作中蔣、胡的描述有點過猶不及，說「蔣鼎文是一個超超武夫，沒有什麼真才實學，我要見他，他會覺得能見到一個名作家是很高興的……他好像一個剛剛上臺的新演員，無所措手足」；說胡宗南「是一個耍猴戲的癩三，使人作嘔……幼稚可笑，最多不過像舊時的上海野雞大學裡的一個混文憑的有點阿飛氣息的學生，實在不必放在眼裡。」¹客觀地說，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尤其是黃埔第一期師生，文化水準都不算低，而蔣、胡兩人更非泛泛之輩。論讀書，他們都有十二年以上的正規學校求學經歷；論實幹，他們是摸打滾爬，從上百萬人中脫穎而出的。胡宗南在黃埔一期學生中享有「文有胡宗南」之譽。也許他們並非飽學之士，然見過他們親筆所寫文墨的人，都會承認其扎實的國學功底。丁玲以這樣的筆調「貶損」，實是對自己名聲的「無端影響」。

宣俠父對蔣鼎文、胡宗南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而且還深有影響，以至蔣介石在電話裡都要提醒蔣鼎文：「銘三，我們要當心，不要上共產黨的當。」而對於胡宗南的爭取、統戰、乃至策反，則是中共的工作重點，尤其在這一時期，宣俠父與胡宗南實是「親密接觸」。

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共高層領導人就在公開場合對胡宗南「抬轎子」。周恩來說，胡有才幹，內心愛國，比陳誠出色，是「蔣介石手下最能幹的指揮官」；九月一日，周恩來又親筆給胡宗

1 見《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三四九、三五二頁。

南寫了一封密信，暢敘舊情，規勸其「立停內戰、共謀抗日」；十月十八日，毛澤東又以胡的同學、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名義，規勸胡宗南「盡棄前嫌，恢復國共兩黨之統一戰線」。¹

宣、胡兩人交情素深，前已述，當年赴廣東黃埔報考，是宣負責將胡宗南、宣鐵吾、石祖德、陳繼法、樊崧華等十多人帶到廣州的。約一九三〇年底，避居鎮江的宣俠父與胡宗南、戴笠、陳德法、蔣超雄同游鎮江焦山，五位黃埔生（除戴外，均為一期生）詩興大發，同在一幅《焦山圖》上題詩留念，胡宗南的題額為：「焦山一拳大，捶破大江流」，宣俠父的題詩，作者蔣超雄記憶未全，其中有「金焦日落夜潮生」句；戴笠的題詞：「風風雨雨，我隨諸兄上焦山」；蔣超雄所寫為：「中流砥柱焦山在，風雨同舟會至友」；陳德法題寫：「既寫焦山又寫人，人與焦山兩不分」。²

宣俠父於一九三七年八月起到徐州拜訪胡宗南，時淞滬之地硝煙瀰漫，胡宗南部也整軍待發。胡宗南見宣到來，十分高興，兩人暢敘衷曲，視察防務，探討對日作戰軍事。應胡的要求，宣將其對胡宗南所講的內容，以及平時的思考，用一個通宵撰寫成《遊擊戰爭概述》一文。胡宗南讚歎不已，印發全軍官兵學習參考，並要求宣俠父輔佐他。宣所撰此文後在一九三八年西安《救亡》週刊第五期發表，引起全國軍事界、文化界的稱道。在文末，宣俠父作了附記：

這篇東西，今年八月下旬在徐州旅邸，應宗南將軍的要求，以一天功夫，匆匆寫成的。在當

1 參見經盛鴻《胡宗南大傳》，團結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〇〇—一〇二頁。

2 蔣超雄：《宣俠父鎮江避難》，《縱橫》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時，手頭沒有一本參考書，而自己對遊擊戰爭，又沒有何種的研究，但在這民族戰爭的開始時期，我對於胡將軍能夠注意到遊擊戰爭這一點，我是衷心地感到可以欣幸的。因此我就不揣冒昧，把自己對於遊擊戰爭的淺薄知識，概念地寫了出來，交給他，或許是為了面子上罷！他給了我一點誇獎，我當時的答覆，只是紅著臉笑了一下，現在把這個稿子去發表，還是為了朋友的要求，要想修改或整理一下，實在也沒有這樣一種心情，那末只好把原稿拿去完事。這自然談不到什麼貢獻。但如果因此而引起讀者們對於遊擊戰爭的研究興趣，那末，在我總算是無上的收穫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國府宣言否認北平偽組織之日。¹

胡宗南返防西安後，兩人交往更為頻繁。同時宣俠父將兩人的見面也隨時彙報給中央，至一九三八年初胡宗南開始籌建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胡又誠邀宣俠父出任要職。

宣俠父如此密切地接觸胡宗南，是奉中共中央之令，力圖策反胡宗南投向中共。對此，宣俠父夫人金鈴整理的《宣俠父》中已明確說明。²前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日接受《中國秘密戰》作者郝在今的採訪時也印證：「蔣介石殺害宣俠父的深層動機是防止中共策反胡宗南。」³

宣俠父是一位文武全才，武能領兵打仗，文能高頭講章。蔣介石不計前嫌，竭力籠絡。約

1 《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2 《中共黨史人物傳》，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十五卷。

3 郝在今：《中國秘密戰》，金城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三八頁。

一九三一年，蔣超雄專程赴南京求見蔣介石，告知宣俠父正在他這裡小住。蔣介石即對他說：「以品學和才能講」，宣俠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並立即派車，命蔣超雄接宣到他這裡談話。談畢，蔣介石交給蔣超雄一張紙條，讓他閱後交待從副官辦理手續，上面寫的是「委宣俠父為本會少將參議。中正」。其後，蔣介石派宣俠父到駐紮在淮陰的第二十五路軍梁冠英部任職。

抗戰初興，顧祝同、蔣鼎文認為宣俠父並未在中共就任高職，力邀宣到國民黨任職。蔣鼎文還說，憑宣的才幹，再「到德國留學，深造提高」會前途無量，而所需一切費用和具體事宜都由他安排。前已述及，胡宗南對宣俠父的延攬不遺餘力，又建議他當軍長，又推薦他出任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廳」廳長等等。但宣俠父有自己堅定的信仰和追求，對於這些高官厚祿，他都看得雲淡風輕，不為所動。

當利用收買不成，宣俠父卓有成效的統戰宣傳工作又將對國民黨軍隊和上層人士產生廣泛影響之時，蔣介石和蔣鼎文採取了極端的手段。

時任軍統局西北區區長的張嚴佛（即張毅夫）曾寫有《宣俠父被殺真相》一文。他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樓去見蔣鼎文，剛進房門，就瞥見一個壯實高大、臉帶紫色的人，坐在沙發上面與蔣鼎文談話。我只好退出來，在外面候著，時間不久，那人出來了，我再進去，蔣鼎文對我說：『剛才那個人就是宣俠父，諸暨人，和我同縣，黃埔第一期的。我在他們那一期當過隊長，所以他和我有師生關係。他是個老共產黨，八路軍派他到西安來和我們接頭的。他經常找我交涉，要求補給八路軍的武器、軍用品、現款，要這要那，糾纏不清……實在難對付。我非常討厭他，頭都被他鬧昏了。這個人狡猾得很，共產黨派他到西安來不簡單，你們要特別注意他。』」

此後，張嚴佛即指示西安員警第一分局局長李翰廷在「八辦」門口加設警察派出所作為固定監視所，重點監視宣的行蹤。同時，張嚴佛動員西安警察局長杭毅、十六軍軍長兼西安警備司令董釗等黃埔師生以及西安行營的相關諸暨人，請他們以各種關係和宣俠父套交情，張嚴佛還指使楊虎城舊部、三十八軍參謀長陳子堅監視宣俠父與孫蔚如、杜斌丞、趙壽山等人的接觸，從而掌握更多的情況，彙報給蔣鼎文。軍統局根據西北區的彙報，向蔣介石報告了宣俠父的五大「罪狀」：

一、宣俠父在西安與楊虎城舊部杜斌丞、趙壽山以及趙壽山派駐西安辦事處處長、老共產黨楊曉初等來往勾結，教唆杜斌丞、趙壽山等反中央、反蔣。

二、宣俠父與西安各方面左傾人物廣泛接觸，打著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動西安學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宣俠父所在地成了左傾人物、青年學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學校學生思想混亂，學生不安心求學，學風敗壞。

三、宣俠父在西安以黃埔同學關係與機關、部隊軍官拉關係，散播共產主義思想毒素，影響所及，勢將引起軍官思想動搖，部隊叛變。

四、宣俠父在西安「公開指摘中央，誹謗委員長」限制言論、出版自由，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歧視共產黨、不補充八路軍武器軍用品，散布不利於中央和破壞抗戰的言論。

五、宣俠父在西安指揮共產黨地下組織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等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張嚴佛調到武漢軍統局，他把在西安監視宣俠父的動向再次當面向戴笠彙報，戴又再次彙報給蔣介石。

蔣介石聽過幾次彙報後大為惱火，曾對手下人說：「哪一次沒有他？（即每次倒蔣都有宣俠父）」¹ 宣俠父似乎一直與蔣介石作對，且對蔣的示好始終不領情。

一九二四年秋，宣俠父大鬧黃埔軍校，使蔣介石下不了臺階，是蔣唯一開除的黃埔一期生。

一九三一年，蔣介石安排宣俠父以軍委會少將參議名義到梁冠英的二十五路軍任職，宣卻鼓勵梁不要聽從蔣介石的命令，不要將部隊開到鄂豫皖邊區去剿共。

一九三三年五月，宣俠父策動馮玉祥、方振武等成立名為抗日同盟軍，實為反蔣倒蔣之組織。同年底，宣俠父和吉鴻昌、南漢宸組織共產黨領導的「反法西斯大同盟」，矛頭再指蔣本人。

一九三四年夏，宣俠父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聯絡胡愈之、鄒韜奮、杜重遠、章乃器、田漢等，積極宣傳抗日反蔣思想。

一九三五年五月，以中共華南工作委員會書記身分，策動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高舉反蔣抗日大旗。

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期間，宣俠父與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成立新的十九路軍，又圖協力討伐蔣某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後，抗日統一戰線逐漸形成，宣俠父以合法的身分，積極宣傳中共抗日思想，動員大批青年去延安，以他廣泛的社會關係，滔滔的口才，淵博的學識，鼓動的才能，常常使聽者折服，竟連胡宗南這樣的高級將領也都被他搞得搖擺不定。

宣俠父的每一次舉動都會搞出全國性的響動來，歷次的反蔣活動他都站在風口潮頭。蔣介石遂

¹ 《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三三一頁。

決定除掉宣俠父。一九三八年七月，蔣介石手諭蔣鼎文，「著將宣俠父秘密制裁」。蔣鼎文將密令轉至軍統西北局執行。於是，時任軍統西安區代理區長的中校情報股長徐一覺、行動股長丁敏之、直屬組長李翰廷合謀暗殺方案，由軍統特務丁善慶、李俊良、佟榮功、文茂官、趙春安和軍委會西安別動隊王寶元、張××等下手綁架暗殺。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時許，宣俠父打籃球結束，騎自行車至西京醫院門口，特務用汽車擋其去路，並上前奪其自行車。宣厲聲喝道：「你們要幹什麼，我是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特務們說：「知道，蔣主任請你。」說完將宣架上汽車，在車子上用繩索將宣勒死，屍體投入市郊預先選好的一口枯井裡，上面又埋了幾車土。

宣俠父失蹤後，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雲甫直接追問蔣鼎文，蔣鼎文推說不知道。後周恩來又多次催問蔣介石，蔣介石才在十月間承認「是我下令殺掉的」¹。

蔣超雄則是另外一種說法。他說，他到重慶工作後，一次到財政部緝私署署長（時石祖德為副署長）、宣俠父的諸暨同鄉、黃埔一期同學宣鐵吾家裡做客，兩人晚飯後閒談。蔣超雄說十分惦記宣俠父，雖多方打聽，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此時「鐵吾轉頭看看，見四周室內無人，便低聲向我說：『他死了，很慘！』我聽了十分震驚。他接著說：『半年前蔣銘山由西安來重慶，他來看我時說，俠父是延安第十八集團駐西安辦事處領導人之一，他批評國民黨抗戰不力，積極反共，還寫文章，到處演說，鋒芒銳利，給長官部工作帶來很大的阻力，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請得上級同意把他處理了。』我問：『是行刺，還是暗殺？』宣說：『在一天夜裡，宣俠父一人獨行時被綁架，就在長官

1 《宣俠父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四〇八頁。

部後花園裡將他殺害，然後把他投入一口枯井中，並用砂石將井掩埋填平，上面又種了樹。外界誰也不知道這件事，只知道宣俠父失蹤了。」¹

看來，為了階級利益，表面上觥籌交錯、談笑風生，暗地裡卻你死我活、刀光劍影，傳統的豆萁相煎成了亙古不變的永恆。

中共中央為宣俠父的失蹤一再公開向蔣介石、蔣鼎文、胡宗南要人。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新中華報》發表了由謝覺哉起草，以宣俠父之妻金婉林（金鈴）署名的「宣參議之妻呈請最高當局雪冤」狀，頗使「二蔣一胡」陷入尷尬境地。

1 蔣超雄：《宣俠父鎮江避難》，《縱橫》一九八九年第六期。